

第二章 西域佛教的建寺文化

○ 乱华的五胡哪里去了？

于中国的战国时代（B. C.475-B. C. 221），“西域”这片土地，还是一个神话的境地。汉代（B. C. 206-A. C. 220）所称的「西域」（Western Lands），即中国史籍上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和帕米尔（Pamir）以东地区诸国的传统称谓。《左传》说：「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使有车辙马迹焉。”」《穆天子传》记载西周穆王（西元前 947-928 年在位）姬满曾自宗周首途西巡，半年后于今日所称「天池」的昆仑瑶池与西王母会见，并特意观览了“黄帝之宫”。

周穆王向西王母道别时说“予归东土”，西王母则以“徂彼西土”惜别，这是以昆仑山区别东土、西土之首见。在汉朝时所领辖的就称为“东土”，汉地以西则统称为“西域”，受到历代沿用。到了西元 1884 年，清光绪十年新疆建省后，“西域”这个名词才逐渐不常用，而后来因为外国学者的考古热，又重新让“西域”的字眼出现在关心者的前面。

谈西域佛教，因为流行的区域包含现今的蒙古、外蒙、新疆一带，所以先要说明一下中国西域的游牧民族。千百年来，迁移纵横在这一大片草原上的各种民族，相互侵占、混血，或者臣属、通婚，人种变得很复杂，有些较弱小的民族甚至被灭了种，要如何追根溯源是十分伤脑筋的事情。那么这些种族又来至何方？《圣经》的资料曾说，黑发黄肤的闪族人往东而去，可能来到亚洲的中国。又传说大汉民族来自昆仑山脉，后来入侵中原，把原住民蚩尤的后裔赶往云贵地带。还有我们从沙漠里的木乃伊，发现消失的古代楼兰人，竟然是黄发白肤的人种，这和埃及人或欧洲人是否有关系？因为有太多的未知，如今只能依靠先进的考古与基因调查，获知一些信息，才能累积判断，找出西域的游牧民族的始末。

以目前台湾的教育习惯，教导大部分的国人都以为自己是汉人，其实现在要找出不卷发、单眼皮、脚小趾多一小片指甲的纯种汉人还真难。站在华人的立场来看，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汉族国家边境有许多外族人，如东胡、西戎、南蛮、北狄。但是千百年来到底这些族人去了哪里？一直都是我们心中的疑惑。

根据历史资料，我们知道商代时周边的“方国”甚多，有人方、犬方、祭方、龙方、犬戎、羌方、危方、鬼方等等，远夷则有肃慎、氐、羌、濮等。

周朝时有夷、狄、戎、羌、肃慎等等诸部族；春秋时有东胡、肃慎、淮夷、东夷、戎蛮、白狄、百濮等等；战国时期有匈奴、月氏、乌孙、析支、夜郎、且兰、九夷、东越、闽越等等。

汉时乌桓族与鲜卑族分布东蒙古高原；扶余、肃慎、沃沮各族分布松、嫩、黑龙、图们江流域；大漠南北为匈奴地，另有呼揭、坚昆、丁零为匈奴之役属；青藏高原为诸羌地，有宝髻、孙波、象雄、女国、白兰等国族；云南西南部为哀牢夷地。

东胡在秦汉之际，与匈奴东西并立。楚汉之际，东胡王为匈奴冒顿单于所破杀，余众逃走则分散成为不同名称的部族，如乌桓族、鲜卑族与室韦契丹。

匈奴在到了三国时代，早已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降汉入居于塞内，乌桓族也入居塞内，北匈奴则西去。鲜卑族于是乘机日渐拓展，据有原来匈奴大漠南北之故地，套西为西部鲜卑，西辽河流域为东部鲜卑。羌胡则据居河套内，而西域伊犁河流域为乌孙国。

东晋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于四世纪初，被东汉以来入居内地的各族所推翻。各族在中原和巴蜀建立了二十多个政权，既有十六国。其各族建立的小国如下：

匈奴：秦汉之际，与东胡东西并立。刘渊建立汉——前赵（304-329A. C.）铁弗赫连勃勃建立夏国（407-431）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北凉（401-439）。

鲜卑族：慕容皝建立前燕（337-370）慕容垂建立后燕（384-407）乞伏国仁建立西秦（385-431）秃发乌孤建立南凉（397-414）慕容德建立南燕（398-410）拓跋圭建立北魏（386-534）宇文觉建立北周（557-581）。

氐族：巴氏李雄建立成汉（304-347A. C.）苻洪建立前秦（350-394）吕光建立后凉（386-403）。

羌族：姚萇建立后秦（384-417）其一支党项族人（有说是鲜卑族后裔）李元昊建立西夏国（1038-1227）。

羯族：石勒建立后赵（319-351A. C.）。

高句丽族：高云建立北燕（407-436）。

契丹族：乞台（波斯人对中国人之称呼），耶律阿保机，并八部为一国，建立契丹——辽（916-1125），相继征服黑车子室韦、女真、乌古、室韦、吐浑、党项、鞑靼、沙陀等部。

沙陀部：李存勖建立后唐（923-936）石敬瑭建立后晋（936-946）刘知远建立后汉（947-950）刘旻建立北汉（951-979）。

女真族：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朝（1115-1234）；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满族清朝（1636-1911）。

两魏之时有突厥族，其祖先建国于西海之上，初兴于阿尔泰山之阳，臣属于柔然。厌哒后来退出葱岭以东，吐谷浑建都伏俟城。至陈齐时，突厥已袭降铁勒，破灭柔然，西破厌哒，北并契骨，东有室韦，疆土南北近六千里，东西达万余里，成为一大国。隋时突厥分为东西两部。唐时，突厥与土蕃是唐朝的二大敌国。

回纥本是铁勒部十五部之一，原臣属于突厥，却于唐玄宗天宝年间攻灭突厥，尽得突厥故地。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回纥被黠嘎斯所破，其部族分支又西迁。

宋时青藏为土蕃诸部及黄头回纥，西域为西洲回纥及黑汗王朝（操突厥语族的喀拉汗朝）。

蒙古部古为蒙瓦（新唐书）、盟古（辽史）、盟骨（金史）、蒙古（契丹事迹）、盲骨子

（松漠纪闻）——意为长生的或永恒的部落。他们原居额尔古纳河一带，后来迁移，渡过呼伦湖（腾吉思海子）到达鄂嫩河（斡难河）源头，据居不而罕山（大肯特山）下。于今鄂嫩河、土拉河（土兀刺河）、克鲁仑河（怯绿连河）三河知源头，其水草丰美、土地肥沃之地区，作为蒙古族的发祥地。后来蒙古之尼伦部勃而只斤铁木真在中国建立了元朝（1271-1368）。

塔塔儿部又称阻卜（辽史）、阻（金史），宋人称达怛（鞑鞑、达鞑），曾经成为蒙古草原各部的通称，是蒙古部兴起以前，漠北草原最著名的一个大部。控制着呼伦湖、贝尔湖附近最富饶的草原。

乃蛮部属突厥语族部落，可能是南迁的一支黠戛斯部落，始居于叶尼塞河（谦河）流域，后来居住于蒙古高原西部，控制着阿尔泰山东西的广阔领土，信仰景教。

匈奴、鲜卑、氐、羌、羯本是汉代的外患，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厌哒、蒙古、突厥、靺鞨、契丹、女真、柔然、土蕃、回纥、西夏、南诏、大理、辽、金、达旦、满（后金），有这么多的民族，混合成了所谓的华夏民族，后来含混地统称为华人，可是原来的他们跑到哪里去了？又有多少的方言形成了现在的语言？由于游牧民族的习性，并未留存有详细的历史资料文献，他们到底去了哪理？实在无从细考，这真是一大疑惑。

○西域的范围

自古传说：「不去西北不知中国土地之大」西北就是这片广大的西域。罗马史学家称西域这块区域为（Serindia）——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地方——“亚洲腹地”，象征亚洲的心脏，是小范围的西域，曾被中国佛教僧侣称为「小西天」；大范围所称的西域，一直是长达七千多公里的“丝绸之路”（Silk Road）所经过之地。

这块广大区域是数千百年来欧亚混血人种飞跃的大片草原，是畜牧者与务农者之间复杂共生的区域，来往着有塞种人（Saka，称塞克人或斯基泰人 Scythian，古代允姓之戎，也可能是远自东北亚古族的肃慎人）、丁零人、月氏人（禺氏人，希腊人称之为卡西亚人 Casia，或是驹支人，有可能也是斯基泰人之一支）、匈奴人、乌孙人（Osin、Wusun）、康居人（Kangit，弘吉刺人）、柔然人、羌人、鲜卑人（Sabir）、突厥人、回纥人（Uygure，祖先是商代时的鬼方人，汉时匈奴人，后于唐末改名为回鹘人）。

西域有着蒙古人自东向西迁移；雅利安人、粟特人（Sogdiana，今之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由西往东进入，是古代中国、天竺（Hindu、Sundu、Thindu，古译为身独、信德、信度、贤豆、身毒）、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北非（埃及 Egypt）、希腊（Greece）、罗马（Roman）古文明交织荟萃之地，也是萨满教、琐罗亚斯德教（祆教 Zoroastrianism）、佛教、景教、摩尼教（Manichean，明教）、伊斯兰教等在此发展成熟的地区。

本书提到的西域，是比照《大唐西域记》对西域泛称，包括新疆、天竺一带（含今之印度 India、阿富汗 Afghanistan、巴基斯坦 Pakistan、孟加拉 Bangladesh）、前苏联之中亚地区（乌兹别克斯坦 Uzbekistan、塔吉克斯坦 Tajikistan、土库曼斯坦 Turkmenistan、吉尔吉斯斯坦 Kyrgyzstan、哈萨克斯坦 Kazakhstan）、西伯利亚（Siberia）、小亚细亚（Asia Minor）及古代波斯地方的“安息国”（Parthia，帕提亚，今伊朗 Iran 及其北地区）。这些地区的人都是高鼻深眼，不是黄种人的国度。中亚许多国家都称为某某斯坦，斯坦就是某某民族的土地的意思，如哈萨克斯坦就指的是哈萨克族人居住的土地的意思。

安息国古代也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其境与信仰佛教之“大夏国”（Graeco-Bactria，希腊—巴克特里亚，后来的吐火罗斯坦，今阿富汗北部及南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南部，为希腊遗民、月氏人后裔等所建之国）相接，两国政商往来频繁，大夏佛教流入安息，当为十分自然之情形。

正因为这个区域地理环境的特殊，也因此让我们了解北传的佛教要不是经过满布冰雪的崇山峻岭，不然就是风沙弥漫的沙漠，传播过程显然比“南传佛教”艰辛了许多。但是，近代已经无法在古“安息国”地区找到佛教遗迹，所以仅能由人名安玄（An Hsuan）、安法钦、安世高（An Shih kao，一名安清）及安息香等，了解曾经有一个安息古国（波斯，今伊朗及其北地区）传播佛教甚盛。中国古代是席地而坐，汉灵帝时才引进来自波斯的“胡床”，胡床称为榻（Taknt、Takhta），榻有帝座、椅或长几之义。六朝隋唐以后，床、椅之使用日广，成为中土地区广用的家俱。

大夏（今之阿富汗一带）时期佛教还一度作为压制和驱逐“袄教”的主要力量。往昔，从呼罗珊（Khorasan，即后来的花刺子模）、波斯、伊拉克（Iraq）、莫苏耳，直到叙利亚边境的国家都是信仰佛教，后来又因统治者的关系，改以“袄教”为国教，但西元 713 年起因穆罕默德·宾·卡西姆的胜利，人民改信了“伊斯兰教”，佛教就逐渐在西域消失了。

西域始传的是“小乘佛教”，后来“大、小乘佛教”都从西域传到中土内地，有多位高僧到长安讲学、译经，佛教受到中土百姓的接受，而大大流行开来。这个区域流行过伊朗语、氏羌语、汉语、藏语、通古斯语（鞑鞑 Magyar，女真、满族属之）、突厥语（匈奴、柔然、高车、回纥族属之）、蒙古语（鲜卑、室韦、契丹族属之）、哈萨克语，操着各种语言的民族文化在此相互传播和嬗替。特别在新疆地区是世界四大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在这一大片地区，千百年来有无数的民族统治过，因此今天的我们更须要去了解，以厘清它的变化过程。

而且在“西域佛教”艺术中，让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印度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和伊朗文化的融合情形。所以，新疆地区更一直是考古学的重要地区，也很值得去了解这些古文明、古民族到底融合到什么地方去了，究竟成了什么面貌了。

○天竺佛教八大圣地

印度虽然是佛教的母国，从公元前三世纪一直盛行到四世纪，虽然后来渐渐势弱，也仍然足与“印度教”匹敌。但是如今印度的佛教徒，仅占印度总人口数的百分之一左右。原因是公元 1203 年，印度佛教的最后根据地超戒寺（Vikramasila Vihara），被伊斯兰教摧毁。后来，释迦牟尼佛又被印度教徒收编成为他们毗湿纽神的十个化神之一，教义也被“印度教”吸收，如佛教的空性思想，被吠坛多派（Vedanta）吸收为虚幻（maya）学说。在这样的情势下，佛教徒只好另找生根的国度。于是十三世纪初期，西藏、拉达克（Ladakh）、缅甸、高棉都有印度僧侣前往弘法。

不过，后来在比哈尔省（Bihar）、奥立沙省（Orissa）、阿萨姆省（Assam）以及孟加拉国（Mengal）的孤立村落里仍有小部份的佛教徒存在。由于佛教留下庞大的遗迹，从十八世纪英国殖民印度的期间，英国人发现阿育王石柱、阿羌塔石窟等佛教遗迹以后，佛教曾经存在的事实，重新唤起世人重视。下面就是佛教保存至今的遗迹所在：

天竺佛教有八大圣地：蓝毗尼（本生处）、菩提伽耶（成道处）、鹿野苑（转法轮处）、拘尸城（双树涅槃处）、王舍城（鹞峰山处）、舍卫城（祇树园处）、僧伽施（从天下处）、毗舍离（广严城处）八个地点，是后人为了缅怀佛陀所归纳而成的，后来有的经典就编造说礼敬圣地，纵使因此丧身，也能重获生机。不过到达之后，眼见一片荒芜，莫不令人怅然心悲。所以为因应大量佛教徒的期盼，如今印度及尼泊尔（Nepal）政府都保留或新造景点成为观光胜地，让信徒凭吊。而有关天竺佛教的建筑文化，目前留存的大多是石窟寺，故另在专章还有详述。

蓝毗尼

蓝毗尼（Lumbini）离印度边境不远，与印度的瑙坦瓦（Nautanwa）小镇距离最近，位在尼泊尔的特莱（Terai，泰雷）地区，是尼泊尔的谷仓区，二千六百多年前佛陀诞生于此。从加德满都（Kathmandu）或波卡拉（Pokhara）搭巴士约七小时可到达，如果从加德满都搭飞机到百拉哈瓦（Bhairahawa），再叫计程车前往，路程只剩 21 公里。西元 1976 年，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庇浦拉瓦（Piprahwa）西北约十六公里，发掘出迦毗罗卫城的遗址，与早先认为遗址是在尼泊尔提罗拉科特（Tilaura kot）看来，则迦毗罗卫城应该横跨印度与尼泊尔边境地区。

蓝毗尼园古称为“论民园”，是释尊诞生的地方。近代学者译称为“洛明达”、“腊伐尼林”或“鲁明代”，蓝毗尼是一个长满娑罗树（Sala tree，无忧树）的花园，据称古代劫毗罗伐斯堵（Kapillavastu，劫比罗伐率堵国、迦毗罗卫）国有佛本生处塔。《法显传》中称迦毗罗卫城位在蓝毗尼的西南 15 公里处；玄奘却说迦毗罗卫城在蓝毗尼的西面 23 公里处。现今留有许多阿育王时代以后所建的方形寺院及圆形佛塔遗迹，另外还有七个红砖小圆台，神话象征释迦族（Sakya，中亚的塞种人）净饭王（Suddhodana）的小王子悉达多乔达摩（Siddhartha Gautama）一出生「不扶而行于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今兹而往，生分已尽。』随足所踏，出大莲花。」

千余年前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称蓝毗尼为“腊伐尼林”，其卷六所说：「上作马像，无忧王（即传说阿育王曾于西元前 249 年亲访）之所建也，后为恶龙霹雳，其柱中折仆地。」当时阿育王所立立柱（Asoka Pillar）的马形柱头，在西元 1895 年被德国考古学家费西尔博士（Dr. Alois. A. Feuhrer）发现时已失。幸好柱身上以婆罗迷文（Brahmi，但另有学者认为是俗语 Prakrit 文）刻写阿育王的亲笔敕文，而知阿育王曾派遣高僧到边地传教，广建佛塔，造立石柱，估计当时应有立柱约五十根，目前传世的约十五根。

经费西尔进一步的考古挖掘发现，附近曾有一座砖结构称为摩耶黛维（Maya Devi，摩耶是梦幻的意思，摩耶女神即佛陀之生母 Mahamaya）的庙，庙内有沙石雕刻描绘佛陀诞生的情景。在第四届世界佛教大会上，已故尼泊尔国王玛德拉为蓝毗尼的开发捐资数百万卢比。而西元 1979 年被定为“蓝毗尼年”用来纪念，因此，曾有许多国家捐资在蓝毗尼建了数处佛龛。

菩提伽耶

菩提伽耶（Bodhigaya, Bodhagaya）位于尼连河（Nairanjana，今称 Phalgu river 帕尔古河）河畔，在比哈尔邦（Bihar）伽耶城（Gaya，佳雅城，古属摩揭陀国）城南十三公里处，是佛陀在菩提树（Pippala tree 毕钵罗树，Bodhi tree 觉树）下立誓「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的成道处。此圣地一直是令人崇仰、向往的地点，每日有世界各地前来朝礼的信众。阿育王即位时，初崇信外道，曾下令砍伐菩提树，但枝干虽被砍掉，不久仍新芽繁茂，阿育王知后乃悔悟，而令人修筑十余公尺高的石栏围绕着，如今石栏尚存三面。

此事唐代记说：「昔中天无忧王剪伐之，令事大婆罗门，积薪焚焉。火焰中忽生雨树，无忧王因忏悔，号灰菩提树，遂周以树垣。至设赏迦王复掘之，至泉，其根不绝，坑火焚之，溉以甘蔗汁，欲其焦烂。后摩竭陀国满胄王，无忧之曾孙也，乃以千牛乳浇之，信宿，树生如旧。更增石垣，高二丈四尺。玄奘至西域，见树出石垣二丈余。」

据彦棕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写玄奘到达菩提树下后哀叹不已说：「佛成道时，此身在何处度生。而今像法时代，渡万里来此，想此玄奘业障何等如此深重。」恰有结夏来此安居的数千僧人，见到玄奘如此悲伤，也都跟着哀哭泣来。

原来的菩提树至今已第四代，阿育王所建精舍已经无存，但阿育王弘法石柱（Ashoka pillar）留下半截柱身及残留字迹。据说西元二或四世纪时，在阿育王所创建的寺塔处，由锡兰国王改建为摩诃菩提寺（Mahabodhi Samgharama，称正觉塔或大觉寺）是硬质砂岩构成，有一座中央尖塔式的建筑物，塔高约五十二公尺，底层为边长各十五公尺的四方形台，逐渐向上收缩，顶部为圆锥状，上立有一铜制螺旋圆顶。中土宋代皇帝曾修建此正觉塔，并立碑为记，十三世纪虽经“伊斯兰教”教徒入侵，因事先以泥土覆盖，免遭劫难。（另说，十四世纪时，缅甸国王又在阿育王的塔寺遗址上重建。因遭受洪水后，被泥土掩埋。）西元 1861 年由英国考古学家亚历山大·康宁汉（Alexander Cunningham

) 挖掘后才重新出土。

西元 1870 年代末期，菩提伽耶经缅甸佛教徒孔林汉等发心整修重见天日，还从斯里兰卡移植新的菩提树。大塔外墙周围有各式各样的佛像，一楼大殿内有一座镀金的佛陀「降魔正觉」像 (Buddha in Bhumispaisha Mudra, 触地、降魔手印)，还有建于西元前二世纪的红砂岩厚石板雕刻的金刚宝座 (Vajrasana)，塔左小圣殿前保存了一座圆形的石座，上面雕刻了一对佛足印 (Buddhapada)。目前有各国佛教徒所建的修院林立，大多为西藏、不丹、泰国、日本、韩国、缅甸、越南、台湾、孟加拉等国的佛教团体捐资兴建的。

鹿野苑

鹿野苑 (Migadaya, 也称仙人论处或仙人鹿园, 今称 Sarnath 沙尔兰特、萨尔那特) 属古婆罗提斯国 (今之 Banarasi, 婆罗奈), 位于恒河 (The Ganges river) 畔, 现今北方邦 (Uttar Pradesh) 的古圣城瓦拉纳西 (Varanasi) 西北方约十公里处, 是佛陀悟道后初转法轮, 开讲四圣谛的地方。玄奘记有:「大垣中有精舍, 高两百余尺, 上以黄金隐起, 作庵没罗果, 石为基陛, 砖作层龕, 龕匝四周, 节级百数, 皆有隐起黄金佛像。」十二世纪末, “伊斯兰教”教徒入侵后, 所有古佛塔、红砖寺院全数被摧毁。

园中近代由英人康宁汉挖掘出土的, 最醒目的是传说佛之父王净饭王 (Suddhodana, 首图达那。但可能是指阿育王) 为纪念佛陀成道所建之塔 (Dharmarajika Stupa, 达玛拉吉卡佛塔, 法王塔、法轮塔), 塔为砖造覆钵式塔, 估计原塔高 143 公尺, 下层石筑, 上层为实心砖砌, 是阿育王供奉佛陀舍利的地方。塔旁有古佛寺遗址及被列为印度国宝的阿育王石柱, 柱头雕刻四只背靠背腿挺直、连身圆雕的狮子 (象征王权, 狮头上有残痕, 疑是有象征法王与转轮圣王的“法轮”), 面向四方, 足踏覆莲座, 用以象征帝国由于推行佛法而威震四方。

如今印度共和国的国徽就是以该柱为蓝本, 采由正面可见的三面狮头雕像, 附有天城体梵文『法胜』二字。此石柱应是犍陀罗的希腊式艺术创作品, 尤其采用鹿野苑出产质地精致的黄白色岩石雕刻, 并且打磨得光洁发亮, 玄奘形容「石含玉润, 鉴照映彻」。鹿野苑在「笈多王朝」时 (西元四到八世纪) 更是一个佛像制造中心, 而该达玛拉吉卡佛塔也改建于笈多王朝时期。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写佛寺“香堂”说:「区界八分, 连垣周堵, 层轩重阁, 丽穷规矩。……大垣中有精舍, 高二百余尺, 上以黄金隐起, 作庵没罗果 (芒果)。石为基阶, 砖作层龕, 龕匝四周, 节级百数, 皆有黄金隐起佛像。」西元 1194 年, “伊斯兰教”大军由库塔布丁·艾贝克 (Qutubuddin Aibak) 率领横扫鹿野苑, 焚烧一切, 使佛教从此在鹿野苑消失。

此地于公元 1931 年新建了一座慕尔甘达·库提寺 (Mulgandha Kuti Vihar), 是模仿菩提伽耶的摩诃菩提寺的样式 (另说是依据阿羌塔石窟佛寺为蓝图), 里面供奉佛陀初转法轮 (Buddha in Dharmacakra Mudra) 的金色佛像。寺内墙上为日本画家野生司香雪

的作品，是描述佛陀生平故事的彩色绘画。寺的右侧庭园内，有一棵从斯里兰卡切枝移植来的菩提树。另外此地还修建有中华寺以及其他国家型式的寺院。

王舍城

王舍城（Rajgir 拉杰吉尔，后改名 Rajagriha，即皇室宫殿之意）也在比哈尔邦巴特纳县伽耶城附近，是西元前第六世纪时「摩竭陀王朝」（Magadha dynasty）建都之处，位于那烂陀（Nalanda）南方十二公里。王舍新城也是佛陀平服醉象及开演《法华》之所在，佛陀在此讲经达五年之久。而且频婆沙罗王（Binbisara，毗婆罗王）所献著名的“竹林精舍”房舍（维奴拉那 Venurana vihara，另又说土地为迦蓝陀 Kalandaka 长者从外道手中收回，所献出之竹园）、耆婆芒果园精舍（Jivakamravana），以及那烂陀僧伽大学（Nalanda Monastery）遗址也在此附近，仅距离王舍城 11 公里左右。

王舍内城是在我们所熟知的灵鹫山（Gridhrakuta Hill、Vulture Peak，亦译为耆闍崛山）等五座山峰环绕下，城南山（Vabhara）拉杰吉尔的七叶窟（Saptaparnaguha Saptaparni Cave）更是佛涅槃后六个月，大弟子大迦叶尊者（maha Kasyapa）集合五百阿罗汉（Arhat）成立僧团（sangha），并作“佛经第一次结集”之处。

舍卫城

舍卫城（Sravasti）法显写作拘萨罗（Kosala）国舍卫城，在今之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贡达（Gonda）·巴何莱契区拉普提河（Rapti river）南岸，正确的遗址位置仍待考证，它是古代商业要地，也是重要的宗教和文化中心。为当时“婆罗门教”研习《吠陀经典》之重要地方，也是“耆那教”的圣地，因此常造成宗教政争，佛教在此受到急速灭减的命运。

此城中的“祇园精舍”（Jetavana Vihara）是昔日长者须达多（Sudatta，又称 Anathapindik 善施、给孤独）与祇多（Jeta）太子合捐“逝多林给孤独园”，作为佛陀说法之处，佛陀在此度过二十四个雨季。

僧伽尸

僧伽尸（Sankisa, Sankasya，亦译为劫比他国 Kapitha。）今又称山伽西或珊卡西亚，在中印度，今北方邦法鲁迦巴德。僧伽尸是佛上忉利天（Trayastrimsa Heaven）善法堂，为母说法三个月后，降还人间之处。古代传说城西二十余里有大伽蓝，伽蓝之大垣内有三宝阶之遗迹，为当时帝释化作三大宝阶，让佛陀由此降下人间。

玄奘记说：「天帝释乃纵其神力建立宝阶，中阶黄金、左水精（晶）、右白银。如来……履中阶而下，大梵王执白拂，履银阶而下，天帝释持宝盖，蹈水精阶而左侍，（梵）天众凌虚，散花赞德。」

当然玄奘只能看到后代帝王「垒以砖石，饰以珍宝」的寺院建筑，寺中有佛陀时像，天帝释和梵天王分立两侧。惜年代久远，所以，此地只留有不知何时雕刻的一对巨大佛足印，以表纪念。并曾挖掘出据说阿育王为纪念其地殊胜所立之石柱，柱头雕牛而非狮子（另说是象头）。

毗舍离

毗舍离（Vaisali）位在恒河北岸，古名吠舍厘、薛舍离，是十六国之一“跋耆国”（Vajji）部落联邦的首都。

佛灭后一百年，七百贤圣为“佛教第二次结集”，重订达磨（法）与毗奈耶（律）之处，但此次之「十事争议，均为非法」反造成后来的根本分裂。

距离比哈尔邦的首府巴特那（Patna，即 Pataliputra 音译波罗梨弗或波咤厘子城，意为华氏城）约 55 公里，哈吉普尔（Hajipur）以北 29 公里。毗舍离是佛教古城，也是当时十六国中之一大国，为该城首富维摩诘（Vimalakirti，毗摩罗诘，即无垢或净名）及其子宝积（Ratnakara）的故里，更是“耆那教”教主大雄（Mahavira，救度者之意）的诞生地。

西元七世纪时，玄奘法师所见的吠舍厘城，「基址方圆六、七十里」，「少有居人」，但是「圣迹繁多，难以具举」。该地花果茂盛，盛产庵没罗（芒果），气序和畅，风俗淳质，亦为阿难尊者入灭处，仍存有纪念他的红砖塔（Ananda Stupa）。其不远处贝克罗村（Bakhra）现仍立有高五、六十尺的阿育王弘法石柱，柱南有池，附近不远有纪念塔，曾是猕猴凿水池（Markata-hrada）、献蜂蜜给佛陀的地方。据说佛陀曾在此地附近一位女妓阿姆拉帕莉女（Amrapali，庵没罗树女保护者）所有的芒果园说法，古代「庵没罗树园精舍」之前建有塔。

拘尸那迦城

据说释尊成道时曾答应魔王，当其教法广为人知，声闻弟子皆能护持正教、宣说妙法时便入灭。拘尸那迦城（Kushinagara，库希纳迦拉、拘尸那揭罗，古末罗国 Malla 的一个小城镇。意译有香茅城、上茅城等。）就是佛陀涅槃之处。有说是在今北方邦狄欧利亚区哥拉浦尔县（Gorakhpur），甘达克河（Gandak river）左岸的迦西亚（Kasia，玄奘译为伽悉亚）。但是西元 1823 年葛莱勒（Q. Carlyle）发现了佛陀涅槃的遗迹，则在迦西亚以北一英里半，现名 Matha Kunwar，意即“死王子”，那里出土了佛陀的涅槃石像。

就在佛陀离开毗舍离城欲前往王舍城，途经拘尸城不远的村庄波伐（Pava）时，八十高寿的佛陀接受准陀（Cunda，或译须陀）供养的旃檀树木耳，翌日发病，佛陀自认「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终于在村外西拉尼亚瓦提河（Hiranna-vatii river）西岸，选了树皮白青，叶甚光润的娑罗林双树（Sala tree，有说是四树）下涅槃。

玄奘法师当时所见涅槃庙（Mahaparinirvana Temple）遗址，记有「大砖精舍中作如来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窳堵波，无忧王所建，基虽倾陷，尚高二百余尺。前建石柱，以记如来寂灭之事。」可是当时的拘尸那迦城已是「城郭颓桑，邑里萧条」，故今日既不见石柱，建物也仅存遗迹。

后代则造有涅槃堂（Nirvana Temple），现存放有一百二十多年前出土，长六公尺的镀金卧佛石像，瞻仰这佛像时，从正面看佛颜安详宁静，表现涅槃寂静；从左测看佛的双眉微皱，有为众生悲悯之态；从右侧看佛面带微笑，表现悟道的欣慰。现今新建了缅甸寺和称为双林寺的华僧寺院。

○犍陀罗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犍陀罗（Gandhara，梵语有“香国”或“香地”的意思）位于旁遮普省（Punjab）西北部，印度河西岸，即以今巴基斯坦（古信度国）的白沙瓦谷地（Peshawar，即古称之富楼沙 Purushapura）及其比临阿富汗东部之喀布尔（Kobel，古译为高附 Kao-fu）、斯瓦特（Swat）、巴奈和巴爵尔一带。

西元前327年，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征服阿富汗和印度境内，前一年即攻下犍陀罗。当时印度是属于摩揭陀国的「难陀王朝」（Nanda Dynasty）时期，该王朝奴隶出身的将领旃陀罗笈多·毛里耶（Gandra-gupta Maurya，后来称为“月护王”），趁着在希腊人的控制地区扩张势力，打败亚历山大留驻的军队，以华氏城（Pataliputra，今巴特那市 Patna 附近）为首都，建立「孔雀王朝」（Mauryas Dynasty）成为天竺第一个真正的皇帝。

后来，亚历山大的后继者叙利亚王国的塞琉西一世（Seleukos I，塞琉古·尼卡托）为了换取战象，曾把包括犍陀罗在内的兴都库什山（Hinku Kush Mt.）以南的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阿富汗斯坦和俾路支斯坦（Baluhistan）让给了旃陀罗笈多，使犍陀罗纳入「孔雀王朝」的版图。

后来希腊裔巴克特里亚（濮达、大夏，Bactria）总督狄奥多特（Diodote）起兵反叛“塞琉西帝国”，于西元前250年建立了巴克特里亚及大夏王国（Graeco-Baktrien），随即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南及旁遮普等地，以巴克特拉（Baktra、Bactria，今阿富汗北部巴尔赫 Balkh，古称蓝氏城）为首都，犍陀罗又成为大夏的领土。

大夏诸王在其境内大力推行希腊化（Hellenism），犍陀罗当然也受到影响。西元前139年，大月氏（原居瓜州允姓之戎）侵入臣服大夏，建立「贵霜王朝」（The Kushans），迦膩色迦王（Kaniska）迁都白沙瓦，并大力扶持佛教，曾建立一座大佛塔和僧院。也于喀什米尔举行佛经的“第四次结集”。其后有一王名呼必虚卡王，也是佛教的赞助者，因为在恒河河谷的夏玛普尔（Dshamalpur）发现建立了一座大型僧院，其名为“呼必虚卡的

毗诃罗”。于是在此东方具有希腊古文化影响的地区，产生了特有“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Gandhara，甘达拉）是中亚的文化、宗教重镇，天竺（Sindhu，身毒）佛教经由犍陀罗传到中土，当然也将犍陀罗艺术带入。犍陀罗艺术是一种融合了希腊、罗马、大月氏（the Great Yueh-chih，睹货罗Tukhara，阿姆河上游一带）、罽宾（今卡菲里斯坦Kafiristan及迦湿弥罗Kashmir西部）、康居（Kirgiz，Kossack，即粟特Sogdiana，粟特河流域一带）、塞人（the Shakas，古代居住于伊朗的萨迦人，即斯基泰人Scythians，又称为西徐亚人）、安息帕提亚人（Parthias）艺术内涵的艺术风格，其主体表现留存下来的是佛像艺术。

学者们称犍陀罗艺术可分为兴都库什系、阿富汗系、西域系，于是犍陀罗艺术沿着丝路东传，经过新疆、河西走廊、陕北高原，都留有其踪迹。当然除了犍陀罗艺术，希腊、罗马式的绘画、波斯的壁画与翼兽石雕等艺术，也沿着漫漫丝路传入了中国。

据锡兰所传，「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国王阿育王派遣传道师末阐提（Madhyantika，Majihantika）进入迦湿弥罗及犍陀罗，是为了感化龙族（Nagas，应是蛇族，迦湿弥罗之大莲湖Mahapadama lake附近住居的亚兰人——非亚利安人种）的野蛮人，以解脱其罪业。龙族王阿罗婆拉（Aravola）接受皈依正法，于是土著野蛮人“夜叉”（Yaksa，）领军“盘茶鬼”（Panchaka）之妻“诃梨帝耶”（Hariti）亦共有五百弟子皈依正法。如果是有这个事实的存在，可能有必要去考证，是否为这些土著后来进入象雄地区，影响了西藏的原始本教（笨教）。

在古印度没有龙的崇拜，只有蛇的崇拜，这个习俗是否与莲花同样源自埃及，仍值得怀疑。通常中土把蛇翻译成中国的龙，把大一点的湖当成海。大莲湖海中有一座圣岛，据说就是龙树菩萨（Nagarahara）进入龙宫（岛），把《华严经》（Buddhavatamsaka-mahavaipulya sutra or The flower gallant sutra）背诵下来的地方。

「贵霜王朝」的统治约于西元230年，因受到「萨珊王朝」（西元226-637年）统治者阿尔达西尔·帕帕干的进攻而结束。西元390年，巴里黑的贵霜人在柔然人的压力下，退至兴都库什山以南，在首领寄多罗的带领下，从萨珊人手里夺回了喀布尔、犍陀罗和西旁遮普，建立寄多罗贵霜。

约在西元460年，白匈奴（White Huna、Sveta Huna）进攻位在中印度的寄多罗贵霜（笈多王朝A. C. 320-650，Chandra-gupta史学家所称的小贵霜）前，寄多罗贵霜完全仿效其祖先，十分重视艺术的发展。可惜经白匈奴的破坏，犍陀罗及其艺术从此逐渐衰退烟灭，大量的佛寺和塔婆被焚毁，玄奘大师和宋云路过此地时，只能记下帝日王时期（A. C. 412-454年，Sakraditya，亦即童护王Kumara-gupta）佛教盛况被毁的情况。

后来佛寺和塔婆便不再回复，整个犍陀罗地区留下大量的佛教遗迹，“印度教”庙宇就直接的建在佛教遗址上，这是在“印度教”的湿婆、雪山女神取代了佛教的一切神祇以后。或者是佛教向印度教密宗妥协，逐渐吸收并形成了密教以后，而呈现的模糊状态，才

有那种情形。

在帕提亚时代（西元25-60年，王莽篡汉到汉光武帝、汉明帝期间）希腊文明传播的热浪到达犍陀罗。此时的佛教发展成大乘佛教，佛有三身、无所不在的理念成型，佛陀已被升格为超凡离俗、神威无比的神。因此首次产生了灰泥塑造的无数佛陀与菩萨的造像，而且为了满足信徒们的崇拜需要，迅速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艺术。而石雕佛像则是在「贵霜王朝」迦尼色迦时代（西元128-151）以后发展开来的，于是这时期的佛像有着纯希腊风格的作品。

如果，将犍陀罗所发现的佛像，与福彻尔博士在《佛教艺术的开端》一书中发表的那些得自希腊基督教的耶稣像作一比较，就可知道佛陀像是希腊人按照耶稣和圣徒的风格雕刻的。

由上可知，“犍陀罗艺术”的佛像造型为何有浓郁的古典艺术风格，不管十九世纪的考古学者称之为“希腊佛教艺术”或“罗马佛教艺术”，都是身躯雄健高大，高鼻垂耳、眉细眼大、肩宽腰细，内着僧衣、外着半披肩袈裟。而且是依据希腊本有的“神、人同形同性”的造神风格，将当时已经神化了的佛陀也塑造了佛像，打破了佛教不能显示佛陀形象的禁令。如果从这个事实看来，佛教“像法”时代的即早来临，不知是要怪希腊人多此一举，还是如佛陀预言冥冥之中已定。

○波罗王朝的密教（Guhya, Vajrayana, Mantra）拥护

西元 750年东印度孟加拉「波罗王朝」（Pala）始兴，延续约四百年，为密教（Guhya）佛教的全盛期。原始佛教里没有创造天地的主宰，没有能够左右人们的鬼神，更没有死后可去的天堂。到了此时期，什么都有了，有本初佛，有净土，还有满天的鬼神众，加上古老的咒术，密乘佛教在此时期就显得热闹异常。

「波罗王朝」是兴起于八世纪的东印度恒河平原比哈尔邦（Bihar）及孟加拉（Bangladesh）地区一带，向来对采取保护佛教的措施不遗余力。「比哈尔」之名源自vihara，指的是「佛教寺庙」，可见和佛教的渊源有多深。瞿波罗王（Copala）（西元750～770年在位）先于摩揭陀（Magadha）国建立欧丹陀普利寺（Odantapuri temple）。

其继位者达摩波罗王（Dharmapala，西元770～810年在位）对佛教特别推崇，嫌当时的那烂陀寺（意为大神龙住处，今比哈尔邦巴特纳之巴罗贡村）不够宏大，又在恒河南案的小山上兴建了超戒寺（一般称为超行寺或超岩寺，即以王号命名的毗俱罗摩尸罗寺，Vikramasila temple），该寺中间是大佛殿，四周是显教五十四院，密教五十三院，共计一百零八院，成为当时的密教中心，凡在该寺学习毕业成绩优秀者，国王颁给“班智达”大学者的学位，有重大成就者又称为“守门师”。

接着德瓦波罗王（西元810～850年在位）更将古德来库打卡寺（Traikutaka temple）改建，扩大改名为苏玛普利寺（Somapuri temple），寺中有千佛塔。其后罗摩波罗王（Ramapala，西元1077～1120年在位）于北孟买（Bombay），兴建迦嘎打拉寺（Jagaddala temple）。

可惜约有四百年历史的「波罗王朝」，却在十二世纪中叶，被来自德干高原（Deccan Plateau）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纳王朝」（Sena Dynasty）消灭，佛教因而急遽衰落。「色纳王朝」存在没有一个世纪，在十三世纪初，因更强大的“伊斯兰教”势力入侵，基于强烈的宗教偏见，对佛教徒完全采取镇压，残杀大量僧众，强迫改信“伊斯兰教”，佛教寺院及文物彻底被摧毁，佛教彻底溃灭，而从此在印度消失。

○丝路南北道的佛教

据说可能是在西元550-552年之间，两名聂斯托利派教士将蚕卵藏在一根挖空了的手杖中，从中国带到拜占廷（君士坦丁堡），从此养蚕业就扩展到了东罗马的领地。在之前，由中国输出到欧洲的丝绸，已经广泛影响罗马时代的衣着，其流行之广，不仅贵族穿着，罗马史学家马赛里努斯甚至声称：「搬运工与公差等各阶层都普遍穿着丝绸」。

但是使用“丝绸之路”（德文Seidenstrassen，the Silk Road）这一概念的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生平1833-1905年），他曾三次访华，在西元1877年出版他写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路》一书中，将往返西域的骆驼商队所走的路称之为“丝绸之路”，从此这个名称才被各国学者广泛使用。后来虽然有人尝试以“佛教之路”、“宝石之路”、“陶瓷之路”或“玉之路”等其他的名字来取代之，总没有“丝绸之路”这么贴切。

由于山、海与沙漠阻隔了古代民族间文化的交流，而各自发展了独特的文化。而使得中国、天竺与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交流的，应该以丝路的开通居功最大。现今所称之西域丝路有草原丝绸之路与绿洲丝绸之路两个说法，草原丝绸之路是指横贯欧亚两大陆北方草原地带的交通路线；绿洲丝绸之路是指经过中亚沙漠地带中沿途片片绿洲的道路。隋代学者裴矩在其著述的《西域图记》中写说：「……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有三道，各有襟带。

“北道”从伊吾（哈密Hami）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渡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Gaochang，今之吐鲁番Turfan）、焉耆（Karashahr、Arkcik，黑城、阿耆尼国Agni、Aknidid，龙姓部落）、龟兹（Kucha，今库车、沙雅）、疏勒（Kashgar、Kasc），度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又经钹汗（Parwanc，拔换）、苏对杀那国（Sutrushana）、康国（撒马尔罕，Samarkand）、曹国、何国、大小安国（布拉哈）、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

“南道”从鄯善（今若羌）、于阗、朱俱波、羯盘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Tochara敦薨；突厥语Toxri）、悒怛、帆延、曹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

近年所称的丝路“北路”指的是最北的丝路，此新称的北路由敦煌（Touen Houang）、伊吾（哈密）、乌鲁木齐、石河子、伊宁到今之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碎叶（伊塞克湖Issyk-Kul旁的雷巴奇耶Rybecje附近）、怛罗斯（Dzambul）、沿锡尔河（Syr Darya）畔经过咸海（Aral Sea）、里海（Caspian Sea）旁的阿斯特拉汗（Astrachan）至黑海（Black Sea）的罗斯托夫（Rostov-na-Donu）。

“南路”近玉门关的若羌地区，其佛教的输入约在西元一世纪左右，显然比于阗慢了近百年之久。而从西元220年曹丕建魏国到晋朝、南北朝至西元581年杨坚建立隋朝，这三百六十一年间，西域从东汉末年的二十余国，相互兼并结果，共有七个国家，天山以北有乌孙国（今伊犁河及帖克斯河流域之地）和车师前国（今吐鲁番）；天山以南有焉耆（乌夷，喀喇沙尔Karashar）国、龟兹国、鄯善（罗布泊Lop-Nor、Nob东，今若羌）国、于阗国、疏勒（Kashgari，也称佉沙Khyesa，古之伽师国，即今之喀什）国。又加上鲜卑、柔然（蠕蠕）、高车、厌哒（Ephthal、Hephtalites，白匈奴 White Huns）四个民族趁机而入，在西域长期进行争霸战，但也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大融合。此时期前的西域虽存在着“萨满教”、“祆教”、“道教”等等的宗教信仰，但佛教进入后，逐渐成为具统治地位的宗教。

照《阿育王息坏目因缘经》的说法，大夏金轮王丘就却（他也被称为阿育王）当时所占领国土，也包括中亚的龟兹、于阗、乌孙、康居（今巴勒喀什Balkhas湖以西至咸海一带地区）等地及汉朝部分的领地。但《大唐西域记》里玄奘为何没有提到丘就却在中亚兴建的地方教化中心「如来神庙」——「雀离大寺」？

中国从丝路输出的工艺品除了丝绸之外，还有漆器及灌溉的技术。由中国输出的农作物有玫瑰、茶树、桃、梨、杏、肉桂、黄连、茯苓等；西方输入的有农作物葡萄、蚕豆、胡萝卜、豌豆、胡瓜、胡麻、胡桃、大蒜、香菜、胡椒、苜蓿等。乐器有印度、波斯、中亚的琵琶、箜篌、笳、笛等，另外有阿拉伯的乳香、东非的紫檀、埃及的琉璃。中亚的舞蹈与罗马的杂技，也由丝路传入汉地。可见丝路是如此的繁忙，为了漫长行旅的需要，商人都会依赖宗教的力量来解决精神的寂寥，平安往返数千公里的路程，因此各种宗教也就随着商旅的足迹，传到中原。

○于阗的佛教

位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丝路“南道”，是从敦煌沿昆仑山北麓西行，经楼兰（鄯善）、若羌（Charkhlik，卡克里克）、且末（Qurqen）、于阗（Hotien, Khotan, Udun, 和阗，

今之和田，古代也称马秦、于遁、兀丹、斡端、忽炭。沿 315 号公路现分别有和田市与于田县相邻着）到莎车（Soche, Yarkand 叶尔羌）及蒲犁（今新疆塔什克尔干），由莎车翻越葱岭（Pamir Mt. 帕米尔山高原），向南可到达迦湿弥罗（Kashmir, 今印度之克什米尔）或罽宾（今之阿富汗首都喀布尔 Kabul 及克什米尔一带），是属于较官方的通路。

但是民间的交往捷径，则是由于阗直接到皮山，由皮山经子合（斫句迦，Karghalik）、乌纥而达迦湿弥罗，再西行可至安息和地中海东案。依藏文本《于阗国授记》，于西元前 77 年，汉昭帝元凤四年，佛教在此期间已经由迦湿弥罗进入中土，直接传入于阗。

丝路“南道”是以于阗为中心，于阗有三宝：白玉、丝绸和地毯，都是丝路上抢手的货品，此外也产粮食、葡萄、瓜果、棉花、蚕桑。于阗是历经汉、魏直到北宋，千年以上的古国，其王统持续不断，堪称世界纪录。尉迟氏所建立的于阗国，背负昆仑山，面对大漠，在玉龙喀什河（墨玉河）与喀拉喀什河（白玉河）的滋润下，以产美玉为西域的古国盛名至今。

魏晋以前的于阗只包括今之和田、墨玉、洛普三县的地域，魏晋以后逐渐强大，兼并了邻近的皮山、策勒、克里雅、尼雅、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等，成为西域的大国。玄奘在《大唐西域记》称于阗为瞿萨旦那国：「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诸胡谓之豁丹，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据说于西元前 70 年左右，迦湿弥罗的高僧毗卢折那（Vairochana, 遍照）首先将佛教的思想传入于阗，是信仰迦湿弥罗“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the Sarvastivadins）。十年后，毗卢折那被一商人带至于城南杏树下，以向王伏罪。毗卢折那见于阗王尉迟胜（Vijaya Sambhava），即向王说：「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钵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曰：「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折那鸣钟声告，佛即遣罗侯罗变形为佛，从空中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赞摩寺（利刹寺），此寺就是于阗最早建立的佛寺。

后来于阗王及人民皆敬信推崇佛教，于是当“大乘佛教”传入时，于阗地区开始造佛像，兴建成百的僧伽蓝，成为佛教国家。法显在《佛国记》提到当时城外七八里，有于阗王所建新寺：「可高二十五丈，雕文刻缕，金银覆上，众宝合成」的（覆钵式）佛塔，塔后作佛堂。梁柱户扇窗牖，皆以金箔。别作僧房，亦严丽整饰，非言可尽。岭东六国诸王所有上价宝物，多作供养，人用者少。

在今新疆蒲洛县西北沙漠中的热瓦克寺遗址，有印度式格局的建筑。其寺院中心建筑覆钵式的佛塔，塔四周筑墙，墙内外贴塑一排排的佛或菩萨立像，寺院反而围着塔建筑，院墙之间形成右旋礼诵的回廊。

法显在《佛国记》提到于西元 401 年，晋隆安五年，他抵“于阗国”，称「其国有四大僧伽蓝，小者数以千计；四月行像，一寺一天，须从一日排至十四」。他挂锡（挂单）最大的瞿摩帝伽蓝，描述说：「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

万人，多大乘学，皆有众食。彼国人民星居，家家皆起小塔，最小者可高二丈许，作四方僧房，供给客僧及余所需。」瞿摩帝伽蓝为大乘寺，僧人有三千人。

据《历代三宝记》载西元 473 年，南朝宋元徽元年，法献在于阗获得《妙法莲华经提婆达多品》、《观世音忏悔除罪咒经》，可知“大乘佛教”已有密教流行。于阗人奉印度财神“毗沙门天王”为护国神，传入内地被称为“护法四大天王”之一，在唐代又成为“军中战神”。而于阗更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地方，充满着无数的古老传说，有关建国神话、蚕丝的传入、鼠坟的故事等等，都随着佛教的信仰，又被赋予宗教的色彩，让于阗佛教注入了新的内容，显得更佳的神奇，也使于阗佛教的艺术增加更多的题材。

于阗东北丹丹乌里克（Dandan Oilug，意为“象牙房子”）有一座唐代小寺的遗迹，是一座小方室，四周围以有等距过道的墙垣；方室中的方形基座，看来以前有一尊大型立佛，因为佛足仍在，此寺为绕佛参礼之用，仿佛是宫塔寺的小缩影。

据经典记载，释迦牟尼佛涅槃后，有两颗佛牙火炼成舍利，佛门称为“灵牙舍利”，视为珍宝，一颗传到“狮子国”（今之斯里兰卡），一颗传到“乌菴国”（今印度北部苏瓦特），后来流落到于阗。

西元 475 年，宋元徽三年，法献在于阗动身返中原时，一芮芮国（柔然）僧人将装有佛牙舍利的铜匣交给他，铜匣宽一寸、长三寸内藏一颗佛牙，还有一方铸有国王面像的铜印，专用来作这个铜匣的封印。法献连同在于阗得到的十五颗舍利，一并带回建康。在整整十五年间，他密而不宣，连弟子都一无所知，仅仅让灵根寺的法颖过目。后来法献将佛牙献给竟陵王萧子良，以示自己对佛的万分虔诚。

听说后来经过许多曲折，隋代时，佛牙被送到长安；五代十国时，佛牙被送到辽之燕京；十一世纪时，佛牙被供在北京西山灵光寺的招仙塔内（画像千佛塔）；八国联军时，招仙塔毁于战火，有幸被寺中僧人从废墟中发现铜匣，才免于丢失。西元 1965 年由中国佛教协会暂迎至北京广济寺，西元 1969 年，在招仙塔原址重建佛牙塔，此稀世珍宝即回原地珍藏至今。

南传佛教国家的治国者，相信拥有、护持并能够展示佛牙舍利的人，就表明他领有政治的合法性。因此，西元 1955 年 10 月，缅甸最高法院大法官等人组团到北京迎请佛牙赴缅，为庆祝次年的佛诞 2500 年；西元 1961 年，斯里兰卡的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为了选前的允诺，也迎请此颗佛牙到斯里兰卡，接受国人的礼敬，而平服了政权的不稳。

西元 1006 年（北宋真宗景德二年）或西元 1009 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于阗古国被伊斯兰教圣战所灭，结束了佛教中心的地位。根据《沙吐克·博格拉汗传》所记，沙吐克（萨图克、沙克尔）是新疆地区第一位信仰伊斯兰教的国王，占有和阗以西的喀什噶尔，博格拉的意思是“公驼”，指的是比狮子更有挑战性，有能在西域战无不胜的称号。

当时本名尉迟孙波（Visha Sambhata，有说尉迟即月氏）的和阗王李圣天虽有“狮子

王”的称号，但是长达数十年的灭法战争，最终仍被葛逻禄族（原为维吾尔族，今新疆喀喇额尔齐斯河流域）建立的博喀拉汗（Bughra Khan）王朝的格拉汗灭了国。被灭国的和阗王族逃到青康藏高原，定居于今西宁一带；有一部分王族和臣民逃向当时的佛教乐土吐蕃。留下来的臣民逐渐地改变了信仰，于是千年以上的佛教国家，最后于十三世纪，正是成吉思汗后裔分领的察合台汗国时期，和阗变成了信仰伊斯兰教的新国度。

○龟兹的佛教

龟兹在古代的中文名称有丘兹、屈兹、曲先、拘夷、屈支、屈茨、归慈、俱支囊、丘兹、库车等多种写法，但若以今天的闽南河洛话发音，念起来大致都同音。龟兹后来在西辽时称为曲先，元代称为苦叉，明代时称为苦先，清代改回称库车州。龟兹为回鹘族之一，也是西域由白氏建立超过千年以上的大国，北依天山，南临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疆域相当于今之库车、拜城、新和、沙雅、轮台、温宿、阿瓦提、乌什为阿克苏所辖及库尔勒的部分地区。

沿着被世界第二大沙漠之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侵据，如今塔里木盆地北缘的丝路“北道”（今称“中道”）是以龟兹为中心，大月氏、安息、康居及天竺诸国与汉地的往来，都以“北道”作交通，是沿着天山山脉南麓东行到中土的。“北道”途经疏勒（Sufu，疏附，今之喀什葛尔，Kashgar）、姑墨（拔换，跋禄迦，今之阿克苏市 Aksu）、龟兹（Kucha、Kuca，今之库车，古称屈支、丘兹等等）、焉耆、高昌（吐鲁番）、伊吾（今之哈密 Hami）等地，一直到敦煌地区，古代的人民皆是信仰“小乘佛教”。

西元前一世纪初叶，疏勒王忠的舅父臣盘因国难避居葱岭西边的佛教地区，因失意之余而皈依了佛教。西元前 73 年，汉昭帝元凤七年，汉使班超到达疏勒，擒获龟兹贵人兜题，恢复了忠的王位，臣盘闻讯，不久回到疏勒（今之喀什）。疏勒是葱岭东西方交通的门户之一，居丝路北道的要冲，佛教因此也传到西域，臣盘可说是有史可考的西域信仰佛教的第一人。

虽然龟兹的人士在历史上常都被汉文史籍冠以白姓或帛姓，龟兹王与焉耆王名之后皆缀 ar juna，含有白与龙之意，属于同族。而逝于西元 348 年，晋康帝永和四年间的神异僧佛图澄，学者也认为有可能是龟兹人。据《高僧传》载佛图澄为中国佛教密宗的先声，他阐扬戒学，自律甚严，声名远播，门徒达万人。他使佛教在晋朝被帝王作为信仰的宗奉，在国家的扶植下，参与军国要政，同佛教教义合为一体。龟兹还把「佛陀」与原土信仰的「神天」结合成「佛天」或「佛神」，也为内地僧人所袭用。

龟兹位于北丝路的要冲，这里是葱岭以东的佛教中心，许多东来西往的高僧都在此地驻锡，宏扬佛法，讲解经典。曾经是希腊、罗马、天竺、波斯和中原文化汇集的地方，西域的经济也在此交融，是当时一个繁荣、富裕的所在。大约在西元五世纪以前，流行在龟兹的佛经是以梵文经典为主，因此有许多佛经都是在龟兹翻译成汉文，其中《正法华经》

成为汉传佛教重要的经典之一。东晋安帝隆安五年，西元 401 年，龟兹国的高僧鸠摩罗什受迎抵达长安，翻译《仁王般若经》、《金刚般若经》。

龟兹人以田种、畜牧为业，地盛产粳稻、麦、糜，出葡萄、石榴、梨、桃、杏等果物。矿产有金、铜、铁、铅、锡和雄黄等，其中以铁为最著名，其所产铁器“恒充三十六国”。开凿石窟要靠锋利优质的铁器，有充足的铁器，更是大规模开凿石窟的必要条件。龟兹的佛寺至今仍有迹可寻，石窟自东向西绵延 250 公里，目前残存的山窟约有 500 余处，如今之拜城县境内有克孜尔千佛洞、台台尔石窟及温巴什石窟；库车境内有库木土拉石窟、森木塞姆石窟、克孜尔朵哈石窟及玛扎伯赫石窟和苏巴什雀离大寺遗址；新河境内有吐乎拉克埃肯石窟。这些寺院是在新月形山脉的陡峭山崖开凿出来的，岩石大殿建筑宏伟，装饰有丰富的壁画，以用来教诲众生。这些石窟的开凿历经约一千年，直到十二、三世纪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国完全统治龟兹后，佛教在龟兹销声匿迹，石窟寺也因之而荒废了。

《晋书》之〈四夷传〉称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高僧传》中记有「雀离大寺」(cakri stupa、cakri sangharama，轮塔或轮寺)即《记集》中八寺之一的「致离蓝」，从遗迹显示，此寺庭宇宽显、图饰华丽。又，《出三藏记集》记说：「拘夷国(即龟兹)，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像，与寺无异。有寺名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蓝，五十僧。剑慕王新蓝六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右四寺，佛图舍弥所统。寺僧皆三月一易屋、床、座，或易蓝者。未及五腊，一宿不得无依止。王新僧伽蓝九十僧，有年少沙门，字鸠摩罗什，才高大，明大乘学，与舍弥是师徒，儿舍弥阿舍学者也。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输若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尼道。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舍弥受法戒，比丘尼外国法不得独立也。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侯妇女，为道运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亦三月一亦房，或易寺。出寺非大尼三人不行。多持五百戒，亦无师一宿者，辄弹之。」因知龟兹佛寺栉比，僧尼众多，佛教极为兴盛。

龟兹在七世纪中叶时，被唐政府统一，安西大都护府治也从交河牵制龟兹首府伊逻庐城，因正逢唐代经济的大发展时期，也带来一片经济兴盛的影响，连带佛教文化发展到了极盛的阶段。九世纪中叶，信仰佛教的回鹘人在安西建立了政权，伊逻庐城仍成为首府，回鹘人将中原及龟兹佛教的艺术吸收，很快的形成有回鹘特色的壁画艺术，让龟兹地区的石窟依然繁盛。可惜，经过十一世纪末叶“伊斯兰教”信徒及近百多年来德、英、苏各国寻宝者的摧毁，在库车、吐木休克、喀喇沙尔和吐鲁番已然不见当时的荣景，但仍残留不少仿效犍陀罗建筑的寺院，可以证明此地的一时辉煌。

○高昌——吐鲁番的佛教

吐鲁番绿洲是东部天山中间的一块山间新陷盆地，其盆地南缘的艾丁湖湖水平面在海平面以下 154 公尺，可知吐鲁番是世界上最低的盆地之一。吐鲁番白天平均气温在摄氏 38 度以上，所以有“火洲”之称。西元前当地的文明早曾与中国、印度、伊朗以及东地中海

的文明交汇与融合，由于汉魏文化的传入，让此地的王国公文以汉文书写。

吐鲁番盆地最早的居民是形似白种人的姑苏人，在战国时代就建立有自己的小王国，以畜牧为业，但受到当时匈奴人的役属。此地区自汉代至魏时称为车师(音「居」师)前部，汉代首在交河设了都尉府，在此时期，贵霜帝国和吐火罗斯坦的佛教已传入此地区。

当地人称高昌城为“哈刺火者”(哈喇和卓)，邻近今之吐鲁番(Turfan)东东南方46公里，在历史上曾是西域的佛教中心。丝路“中路”上的高昌(Kocho、Gao-Chang)又称高壁昌，位于火焰山前的开阔平原带，其地表约在海平面以下40公尺。

因为南北朝时，柔然曾在此建立高昌国而名。西元四世纪下半叶，佛教已成为高昌的国教，高昌更是人人皆知的富庶之地。西元465年，北魏和平六年，柔然(蠕蠕、芮芮、茹茹)征服高昌，因为柔然族也是佛教徒，所以佛教更加兴盛。佛教信仰与高昌王族势力的合流，佛教寺庙也有了家族神龛的呈现，因曾考据出当时有四十多座寺庙是以豪族的姓氏命名。

在唐时称高昌为“西州”、“交州”，且在古雅尔城(崖儿、交河)设置了安西都护府；辽、宋时又称“火洲”、“和州”。

与交河古城齐名的高昌故城，据说是秦汉年代由车师人所建，古来因地势高敞，物产昌盛，故有高昌之称，当地人称为“达克阿奴斯城”。位在火焰山南麓山脚下哈喇和卓村与阿斯塔那村边，是木头沟河浇灌形成之三角绿洲。维吾尔语称高昌故城为“亦都护城”，内城之周回约有六里，外城周长有五千余公尺，建筑布局和当时的长安城相仿。“亦都护”是国王、神圣陛下的意思，“阿斯塔那”则是“首府”的意思。在内城北部的宫城，当地人称为“可汗堡”(Khan castle)。就在堡院的东墙外西南之寺院遗址，德国人勒柯克曾经挖掘出一块北凉承平三年(西元445年)的〈凉王大沮渠安周造寺功德碑〉，证明这里曾经是王家寺院。

城内尚有遗迹达七十余处，大多是佛寺遗址。唐玄奘于西元630年偷往西域取经，途经高昌，曾受到高昌王曲文泰的热诚供养，盛情挽留下来讲了一个月的佛经。并让继续西行的玄奘“悬渡凌溪之险不复为忧”。由此可见当时高昌城是盆地内的佛教中心。

高昌遗迹西克普(Sirkip)古塔，建造年代不详，是一处「宫塔式」的佛寺。此塔为砖构造，四方形平面，基座四面有柱龛，龛高约二公尺，其中一面隔为六龛，与米兰大寺塔基正面柱之龛数相同，规模较小；方形塔基残存六级，塔壁上佛龛密布，其中一面每级各有六龛，中置坐佛像。此寺塔的型制同鹿野苑伽蓝“砖作层龛”的古制相符。高昌佛寺的「宫塔式」型制，则一直延续到九世纪中叶的高昌回鹘时期。高昌回鹘国(即十姓回鹘国)的王廷所在也是在高昌，为了和中原继续保持政治、经济往来，回鹘也让内地佛教流行。回鹘人崇尚红色，所以常在〈诸王出巡图〉等图面看到红旗、红甲服。虽然为丝路之重镇，于吸收汉、印文化的同时，高昌回鹘并未摒弃自己民族的文化。从高昌回鹘佛寺的〈分舍利图〉充满自己民族的鲜明特色，就可看见。

《汉书·西域传》记：「车师前国，王治交河，河水分流而下，故号交河。」南北朝以后古称之交河地区（Jiaohe）成为高昌国的一部分，是曲氏王国（公元499-640年）的第二大城，屹立在两条巨大的河谷之间。从吐鲁番市西行约十公里就可到交河古城，这是世界上保存最古老、最大的土建城市，故城状如柳叶型或船型之半岛，它矗立在古代两河相交而切出的一条高约三十公尺的峭壁谷地上，所以称为交河，因此有着自然形成的屏障。这座至少有2300年历史的夯土城（最新的考古说法却是以「减地法」向下挖掘成街道，然后留出厚墙，再用木材搭盖屋顶，形成街道建筑。）城之腹地呈细长状，全城约有一千七百多公尺长，宽约三百公尺。虽然遗址保存完好，但大部份建筑有烈火烧过的痕迹，古城应该是历经一场大火而被焚毁，看来就是干枯的台地。城中其长约350公尺、宽有10公尺的南北大道，成为全城的交通主轴。

在此南北大道北端，有规模居全城之冠的大佛寺寺院遗址。这座佛寺遗址可能建在南北朝时期。佛寺的主体面积约有5200平方公尺，前院大门朝南大开，佛殿在后，东西厢是僧房，后殿中央建有佛塔，塔柱上部四面开有佛龕，龕中残留的佛像，经风吹雨打已失尽风采。寺后是塔林，塔林中央是一座残高有十公尺之高塔，塔上原有的佛像已不存在，唯有塔之四面各有25座小塔，以纵横整齐的方阵守卫着大塔。如此承现，可能是新疆地区最早的密宗金刚座宝塔。

回鹘是突厥语族的先民匈奴或高车的遗族，蒙古语对回鹘读音的汉译为“畏兀儿”（伟兀、外吾、畏吾而、委兀），故知畏兀儿乃是回纥族（护骨、袁纥）的后裔，今维吾尔族的祖先。唐文宗开成五年（西元840年），可能是大草原发生旱灾与饥荒，造成毁灭性的内哄，被来自现今居于吉尔吉斯坦的另一个蒙古西北高元的游牧民族黠戛斯所灭，十五个被打败的回鹘部落西迁至库车、哈喇沙尔（Karashahr，也就是焉耆 Agni）和高昌，约十年后以高昌为首府，在吐鲁番盆地建国。回鹘王朝后来归属于辽朝，辽朝灭亡后，又成了哈刺契丹建立的西辽国的属国，称为“哈刺鲁”。

但于十一世纪初之时，回鹘的另一个「喀拉汗王朝」（称卡拉汗、哈刺汗国，亦即葛逻录国）的可汗沙土克布格拉汗（撒吐克喀拉汗、博喀拉汗）改信“伊斯兰教”，在他影响下，有二十万“帐”的突厥语系诸部信奉了“伊斯兰教”，使得佛教在中亚东突厥斯坦之地位几乎完全被“伊斯兰教”（因回人信仰，所以“伊斯兰教”从此被称谓“回教”）所取代。西元1209年臣服于蒙古成吉思汗后，高昌即不再是独立的王国。西元1275年，元朝蒙古贵族海都、都哇、卜思巴等发动叛乱，并对效忠元朝的高昌发动了战争，以十二万士兵围攻持续半年之久，高昌王被迫迁出至甘肃的永昌，于是高昌王国的盛世终于走向衰败。

明代初年，有陈诚西行至高昌，亲睹此城残破之状，留下一诗：「高昌旧治月氏西，城郭萧条市肆稀。遗迹尚存唐制度，居人争睹汉宫仪。梵宫零落留金像，神道荒凉卧石碑。」

吐鲁番附近有吐峪沟石窟、伯孜克里克石窟、吉木萨尔寺石窟。吐峪沟石窟是「曲氏王朝」的皇家寺院，也是高昌地区最早开发的石窟群；伯孜克里克石窟位在火焰山主峰的

背后谷中山腰，保存有九世纪以后高昌回鹘时期的遗物；吉木萨尔寺石窟位在今吉木萨尔县破城子，该地古称为“北庭”，是吐鲁番绿洲之高昌“回鹘王朝”的陪都，又称“别失八里”（Beshbalyk），突厥语五为“别失”，城为“八里”，意思是此地曾有五座小城。当十三世纪中时，东突厥斯坦都信仰了伊斯兰教，唯有高昌仍是个单独的佛教文化小岛，继续有着回鹘文的佛教文献编纂。但是直到十三世纪末时，高昌与交河故城，因战乱而废弃，但仍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土筑古城。1383年，吐鲁番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察合台汗国后裔黑的儿火进行圣战，从此新疆地区的佛教文明完全转变成伊斯兰文化所管辖。

○楼兰——迷失的王国

塔克拉玛干（Taklimakan）的意思是“进去出不来”，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楼兰古国就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雅丹”（陡壁小丘，风吹、水蚀的土墩、沟漕及洼地的地貌景观）劣地里，有人称她为“沙漠中的庞贝城”。这些“雅丹”地区称为“乌尔禾”区，夜晚风吹过这些地区，会产生鬼哭神嚎的声音，意思就是魔鬼城。这个茫茫大沙漠也称为“瀚海”，最可怕的名称是“死亡之海”。

西元1899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an Anders Hedin，生平1865-1952年）因维吾尔向导艾尔迪克（奥尔得克，罗布人，可能是楼兰民族的后裔）的发现，终于揭开了被沙层掩埋1500多年的楼兰古城的神秘面纱。

西元1901年，斯文·赫定终于准备妥当进入楼兰（Loulan、Lulan，佉卢文发音Kroraina）古城，他看到了城中高大的佛塔和大型建筑物的遗址，并找到刻着忍冬（金银花）纹饰，装饰华美的木板、木雕、木简和文书。

西出玉门关或阳关，最先进入的是楼兰，此段称作为楼兰道，古城位在今中国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界北境，塔里木（Tarim）盆地之东，孔雀河三角洲的南部，罗布泊（Lop Nur，清乾隆时地图称为鲁普脑儿）西北岸上一片密集的“雅丹”地形中。汉朝时楼兰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与敦煌相邻，古代的丝绸之路其南北两道就是从楼兰分道，也是当时亚洲腹地的交通枢纽城镇。

楼兰国可能是在三千八百年前，相当于商代时期，生活在罗布泊地区的土著国家。如今有学者从出土的女尸的服饰判断，认为楼兰先民可能是塞种族人向东发展的一支。还有从古墓沟古尸头骨判断，具有北欧人的主要特征。学者认为有两个楼兰文化存在，先后有不同的印欧人种到罗布泊地区定居。不管怎么说，至今楼兰国消失掉了，仅留下一片泥城，一些古物，一个很美的名字，一直是个谜样的国度。

《史记·大宛列传》云：「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即罗布泊）。」楼兰与汉朝友好是在西元前126年，开始是张骞从西域回汉地之后。从西汉初年起，汉使及商旅去西域必经楼兰，但楼兰人受了匈奴人的反间计，叛离汉朝攻杀汉使，还杀了安息、大宛（位于今吉尔吉斯坦的费尔干纳盆地，产名贵的汗血马）派赴汉朝的使节。

因此汉元凤四年（西元前 77 年），派傅介子刺杀楼兰王安归，立其弟尉屠耆为王，并改称楼兰为“鄯善”（Carcan 之对音，Cer-Cen，禅善）。汉皇还派遣士兵远赴离长安六千一百里外，来到楼兰屯田农耕，而有着清澈碧波的罗布泊，可知楼兰当时还是西域的绿洲。具考据楼兰当时有着一千五百七十户人家，四万四千一百多人口，分为十二个部落，几乎都是逐水草而居。

可是，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中已称楼兰为“故城”，可见当时楼兰早已埋在沙漠瀚海中了。唐朝诗人李白所作的《塞下曲》写到：

五岳天山雪，无花只有寒。
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楼兰可能是经过一次的严重“热窝子病”瘟疫，加上砍伐大量的胡杨木，作为棺木，造成地下的水含蓄量锐减，而使楼兰急速沙漠化。虽然晋代以后曾设法引水抢救，却没有成功。直到唐代的楼兰已是一个边远的寒地，已经消失在滚滚黄沙之海中。在元代时，马可波罗经过此地，尽是一片荒凉的景象。

在法显的印象中，鄯善国“尽行天竺法”，全国僧人有四千余人，全是修学小乘佛法。玄奘大师回国时，曾被鄯善古国降伏的且末城却已是「城廓巍然，人烟断绝」，“至纳缚波故国，即楼兰地也”未见居民且一片萧条。此且末城传说是经连续四十九天的沙尘吹袭而变成死城，一般认为是塔里木河改道，生活严重缺水而放弃的。

楼兰古城以古水道为中轴，分成两区：东北为寺院区，西南为生活区。寺院区有高耸醒目的佛塔，高有 10.4 公尺，是以土坯和红柳枝夹筑而成。塔基为方形，长 19.5 公尺；塔身高 8 公尺，为八角形；塔顶圆形，直径约 6.3 公尺，残高 2.1 公尺。在塔附近发现了一列拱坐的佛像浮雕，坐佛持定印坐于龕内，是犍陀罗常见的风格。在佛塔南面有一大片的建筑遗迹，斯坦因（Sir Aurel Stein）等人还曾在此发现各种精致雕刻的木板与佛像，推测可能有座佛殿在此。

城外北郊另有一佛塔，与上述佛塔遥遥相对，两座佛塔的造型十分相似，只是塔顶为一平台，台中还有一圆形台基，可能为佛塑像的基座。从所遗留残物看来，楼兰曾是一个佛教兴盛的地方。从楼兰出土的文物，有晋代手抄的《战国策》和汉锦最是珍贵。其他尚有汉五铢钱、丝织品、玻璃器皿、陶器和其他古代钱币。

楼兰地区还有一个重要的佛教遗址——米兰（Miran，有译为密阮、磨朗），有「丝路明珠」之称，她位于若羌县（大鄯善，古称石城镇）东北方直线距离约 70 公里处。还遗留有三至五世纪左右「鄯善时期」的佛寺遗址以及许多精美的壁画，这里可能是鄯善国的佛教中心。

斯坦因曾将在此地磨朗大寺中发现的精美壁画切割下来，运往伦敦，引起轰动。其中最有名的是“带翼天使”像，斯坦因说：「在亚洲腹部（Innermost Asia）中心荒凉寂寞的罗布卓尔岸上，我怎么能够看到这种古典的天使呢？」。印度的飞天本来是没有翅膀的，这种背生双翼的飞天原型，可能是来自希腊、罗马古代艺术中的天使。

○敦煌的佛教与建筑文化

敦煌（原居民族吐火罗 Tokhara、Tusaras 的译音，古称“沙州”）是三条丝路交到中土的一个重镇，是古丝路的「咽喉之地」，历史上称为「华戎所交一都会」，是西方文化传入东方的第一站，曾经是月氏、乌孙、塞种、匈奴、羌族人的共同舞台。西方的香料、药材、金银、宝石以及中土的丝绸、绣品，都以敦煌为集散地。这里也有着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又最先接触到东传而来的佛教与佛教艺术，多处著名的千佛洞就在敦煌附近，所以保存有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

西晋时，世居敦煌月氏族的竺法护，精通三十六种语言，其译经、传教深入长安，并在长安建立佛寺，他是将佛教传入中原的“敦煌菩萨”。敦煌还有一位高僧昙无讖，他翻译了《大般涅槃经》，对大乘佛教的传播有甚大的影响。

拓跋魏占领敦煌之后，一度设立了敦煌镇。北魏是一个崇佛的国家，在其统治下，中原的佛教非常兴盛。北魏任命宗室元荣任敦煌太守时，加封为东阳王，十分致力于莫高窟的开凿。北周时，建平公任“瓜州”刺史，他同元荣一样将中原文化带去了敦煌。隋朝改立敦煌县，唐初改为“瓜州”，一度又改为“沙州”，贞观时曾改为敦煌郡，「安史之乱」后，又复称“沙州”。

「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国力便逐渐衰弱，吐蕃在德宗建中二年（西元 781 年）占领了敦煌。白居易就有诗〈缚戎人〉描述被掳唐人的心情：「一落蕃中四十载，身着裘裘系毛带」、「蕃候严兵鸟不飞，脱身冒死奔逃归。」吐蕃族也是崇信佛教的一族，因此敦煌的佛像没遭到破坏，反而避开了唐武宗「会昌毁佛」的浩劫。

直到唐宣宗大中二年（西元 848 年），经过张议潮领导河西民众的反抗，吐蕃结束了六十余年对敦煌的统治。唐朝于是在敦煌设瓜沙归义军，由张议潮为节度使。张氏家族也是相当崇信佛教，因此在六十年的统治时期，也在当时开凿了不少石窟，计达六、七十个。由于家族式的财力，所开石窟已无唐朝国力显示的磅礴气势，呈现为地方世俗化的色彩。

继张氏家族之后的是曹氏家族，在曹氏统治的一百二十多年间，一直保持着中原的制度与文化。同时也与回纥等国以姻亲结盟，维持了敦煌一时的安定与繁荣。曹氏亦大力提倡佛教，建立画院教导绘画、造像，培养从事开凿石窟的人才。所以在五代与北宋时期，境内佛寺林立，而且对敦煌石窟的新开凿，是有着统一而独立的风格。

宋仁宗景佑三年（西元 1036 年），西夏攻陷沙州，敦煌更形没落。西夏甚少新凿石窟，却以覆盖前代的洞窟而留下相当多的作品。元代信奉“藏传佛教”，此时期就出现唐

密和藏密不同系统的佛像艺术，但已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尾声了。明英宗年间，因为国防的需要，将沙州居民迁往酒泉，沙州遂成为废墟。

西域的石窟群

○支提塔庙——中心塔柱石窟

义净法师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毘奈耶杂事》时，才出现了健陀俱胝——“香殿”这个名词，亦即凡是佛陀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或房舍，又称为“香舍”（Gandhakuti）。意味着那里面有清香鲜花的香味，曾供养着伟大的佛陀，是佛的住处。天竺另一种纪念性的建筑物就是佛塔，又称为“支提”或“塔庙”，不是用来埋藏舍利，而是佛教徒进行教仪活动的石窟建筑。显然已经把在印度最著名的是西元前一世纪挖凿的卡利（Karli 支提，深 37.8 公尺，宽 14.2 公尺，高 13.7 公尺）塔庙，这种石窟型制传来汉地后，空间缩小，窟内无法提供集会的空间，就在附近另建寺院。

中国西域地区最早的石窟寺是出现在龟兹（库车）地区，库车的森姆赛姆千佛洞于西元二世纪中叶开辟，比东苏巴什废寺的年代稍早。“石窟寺”因其内部大量绘制壁画或雕刻佛像，所以又称“千佛洞”。千百年来，西域的许多佛寺已被浩瀚的戈壁沙滩所掩埋了，幸好境内有石窟寺屹立在陡峭的山崖上，保存着古代建筑雕刻、绘画等艺术。

西域古代佛教在天山南麓山崖石壁上，开凿了许多行型制不同的佛窟，一般都称为「千佛洞」。其中一种要以中心柱大形窟式的布局最为完善、合理，塑像、壁画也结合的最美好。这种佛窟有一巨大的方形中心柱，用以支撑洞顶，把洞内划分为宽敞明亮的前室、低矮昏暗的后室和便于行走礼佛的左右甬道。前室塑绘佛像、菩萨、说法图及本生故事，用以宣扬佛教的种种善行。后室有涅槃佛的石台，则塑绘佛陀涅槃像及众弟子哀悼的情景。

一个洞窟就是一座小型佛寺，是礼佛的最佳场所，所以这种佛窟又被称为「礼佛窟」，即「支提窟」（Caityas cave）。在印度供信众礼拜的“支提窟”没有供奉舍利，只有佛像，而有舍利的才称为“佛塔”。汉地石窟内所建的中心塔柱是四方形的居多，如大同云岗石窟的中心塔柱；莫高窟的北魏 251、254、257 号石窟、北周 428 号石窟。

中形石窟寺为窟顶作一面坡的木构建筑，南北壁各凿两层小龕，中心方柱开四面龕；小形石窟寺为长方或方形平面，拱形顶，于后壁凿佛龕，没有中心方柱和甬道；“大像窟”是在前室凿露天大龕，从室内两旁开甬道，成为中心方柱，甬道后开拱形顶的后室，室的后壁凿大石台；另有极少数较不同的方形窟，窟顶以覆斗式藻井逐层凿出，有的套井甚至达七重之多。

○毗诃罗窟

天竺每一石窟群中都有少数的“毗诃罗窟”（Vihara cave），意为精舍、僧院、住处。小乘佛教徒修行的居室、僧房称为“毗诃罗窟”，僧徒们在“毗诃罗窟”中静坐修心，

这种洞窟比较狭小低矮，却是当时苦修的最佳处所，所以又名“禅窟”。

其主要型制是在主室两侧对称各开小室四个、八个不等，能够打坐即可，故小窟只约一公尺余见方。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帝王的倡导，佛教逐渐兴盛，注重禅修、冥想默坐者多，在南北朝时遗留下的“毗诃罗窟”，都是当时开凿的。西域地区仅在克孜尔、苏巴什等地发现一些“毗诃罗窟”，敦煌也只有三处遗留有这样的石窟，其他地方则不见此种石窟。

○涅槃窟

佛教徒最高的希望（成就）是能够如同佛陀一样进入不生不灭、涅槃（Nirvana）寂静的境界。所以“涅槃窟”的卧佛表现出安详宁静、柔软超脱的状态，正是宣扬离苦得乐的最佳说法处。“小乘佛教”国家的涅槃卧佛寺建筑最多，将此种寺缩小成为专供卧佛的石窟，仍是以巨大的佛涅槃卧像为主。不像中心塔柱形的石窟，把卧佛摆在阴暗的环行道的壁龛中。“涅槃窟”的平面为横长形，在窟中造一长方形高平台，将佛陀的涅槃卧像直接横卧在上，以供信众顶礼。

○大佛窟

在古埃及、古希腊及「萨珊王朝」都有制造大型神像的传统，特别在埃及有制造摩崖王像的传统。“大乘佛教”为了安放或雕塑巨大的佛像而特别开凿的石窟，就是“大佛窟”，但其数量比较少。

西元一世纪后的大月氏「贵霜王朝」时期，发展出“大乘佛教”，也开始有佛像的雕塑。据说从二至五世纪时，距今阿富汗斯坦首都喀布尔西北约 230 公里处，位于巴米扬省的山区，在兴都库什山脉（Hindu-Kush Mt.）和巴巴山脉的山谷间，也就是今日哈萨拉亚人的家乡，由僧侣一锤一凿所雕塑出来的巴米扬（Bamiyan，巴米安，古称梵衍那国）大佛像，为后来开凿大佛窟的源头。

带着古典的表情，身披古希腊「出水衣纹」长袍的巴米扬大佛像，有高 38 公尺的东大佛（释迦佛）与 55 公尺的西大佛两尊，大佛两足旁都呈半圆形分布着数间僧房窟，而其附近更是密集的佛龛与石窟。玄奘说西大佛之东有伽蓝，伽蓝内有佛入涅槃卧像，长三百多公尺（千尺余），并庄严微妙。

玄奘说此两大佛金俞石所造，并且“金色晃耀，宝饰灿烂”；东大佛身着蓝色薄衣（可能是后来药师佛的基本造型），西大佛身着红色薄衣（可能是后来阿弥陀佛的基本造型），颜面和双手都镀金。

可惜于二十一世纪开始不久，信奉“伊斯兰教”基本教义派的阿富汗神学士政权，基于信仰上坚执的排他性，为了建立一个纯正的“伊斯兰教”国家，重申禁止崇拜偶像的戒律，无法容忍有人朝拜别的神祇，下令进行「灭佛运动」，捣毁阿富汗境内的所有佛像，

更动用火箭枪炮及爆破方式，摧毁已近二千年历史的两尊大佛。

虽然，事前曾引起全世界文化团体的关切，并有临近国家要求收购佛像，但是阿富汗神学士（塔里班 Taliban）政权的最高领袖欧玛，向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民反问：「你们要被称作雕像摧毁者，还是雕像贩子？」由于是如此的坚持，所以根本无法令其收回成命，此代表欧亚文化环节的两尊大佛终于被摧毁，这真是人类文化的浩劫。

古代中国信仰佛教的帝王，最喜爱开凿弥勒佛坐像的“大佛窟”，以反映其权势，表现对崇高、雄伟的追求。在莫高窟、榆林窟都有数窟大佛窟。而龙门石窟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则属“摩崖佛龕”，不列入“大佛窟”。

“大佛窟”的型制大都为上小下大，地面是方形的平面，窟顶为覆斗式或圆穹顶。为了能让人们瞻仰佛像，通常就在佛像面向的正面壁上设置二、三个小窗，而且窟内也有供攀登的通道。

○佛殿窟——覆斗式石窟

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逐渐出现的方形而无中心塔柱的石窟，因其窟顶为覆斗形状（藻井式，Apsidal）而名之。覆斗式窟顶高高拱起，没有平顶的压抑感觉。这种石窟通常在后壁开龕，像寺院的佛殿一样，故称为“佛殿窟”。其窟室开阔宽敞，很适合绘制构图复杂、规模宏大的壁画。所以，许多内容繁杂、壮观宏伟的“西方净土变”、东方药师佛“东方净土变”、“弥勒经变”等大型壁画多绘制于覆斗式石窟内。空间印象良好，观赏距离足够，信徒不必再进行右绕的礼仪，可以在这里聚集，做一般的供奉、礼佛的活动。

○背屏式石窟

背屏式石窟与“涅槃窟”、“大佛窟”、覆斗式石窟等都是中国所特有的石窟型制。佛教石窟传入中国后，逐渐中国化的进程中，创造出他国所没有的特色。主要见于晚唐的背屏式石窟，型制接近覆斗式窟，也是方形平面，但其面积需要比较大。凿窟之时在坛后沿正中留出一面石壁，作为背屏，迎面的主室设有一中心佛坛于背屏之前，坛上布满佛、菩萨、金刚、力士等群像。坛之四周与四壁保持有一定的距离，当作通道。壁面则不再开龕，让群像均走出佛龕，和朝拜者同处于同一空间，因而像之塑造比较高大。

○阿羌塔（Ajanta，阿旃陀，思空、无思、无想）石窟

“石窟寺”是佛教建筑的一种，印度近代被整理出来的宗教石窟，不下一千二百多个，以位于西印度成群聚集的最多，其中三分之二属于佛教，其余是“印度教”与“耆那教”。由于“大乘佛教”所提倡的六波罗蜜，以「布施」为第一优先，所以大量布施开凿石窟，就突显出信徒的愚诚。

自古天竺有着许多石砌砖造的建筑，但很少被保存下来，却因为天然石窟能免去天灾

人祸，唯独石窟得以在后世重见天日。能够媲美阿育王「孔雀王朝」的是「笈多王朝」(Gupta Empire)，该时期是佛教艺术的黄金时代，阿旃陀石窟就是在那时期开辟，现存最大的石窟。

印度国际大港孟买 (Bombay; 现更名为Mumbai) 属于玛哈拉施特拉邦 (Maharashtra)，只是个商业大港，一直代表着商业竞争的一面，而“印度教”的灵魂重镇则在孟买以南。佛教古迹则在孟买以东，位于该邦德干高原 (Deccan Plateau) 的“伊斯兰教”古城奥兰加巴德 (Aurangabad) 附近三十七公里处，该地附近有不少名胜。尤其距离奥兰加巴德约一百公里处，有媲美泰姬玛哈陵 (Taj Mahal) 的文化古迹阿羌塔与爱罗拉佛教石窟。

早在西元前一、二世纪就开凿的阿羌塔佛窟群，素有「东方艺术之宫」的美誉，大致完成于五、六世纪，有长达七百余年的历史。可惜因为佛教的衰亡以及宗教的轮替，剩下一窟未完成，便转移到爱罗拉石窟的挖掘，于是逐渐让世人遗忘。直至西元1819年被英国马德拉斯军团的士兵们，在一次狩猎老虎的行动中发现，才重现于世。阿羌塔佛窟群共有二十九窟，其中都是精美的古代佛教艺术品，值得介绍。

玄奘对阿旃陀石窟是这般记述：「国东境，有大山，迭岭连嶂，重峦绝巘，爰有伽蓝，基于幽谷，高堂邃宇，疏崖枕峰；重阁层台，背岩面壑，阿折罗阿罗汉所建…伽蓝大精舍高百余尺，中有石佛像，高七十余尺，上有石盖七重，虚悬无缀，盖间相去各三尺余。闻诸先志曰：斯乃阿罗汉愿力之所持也。或曰神通之力，或曰药术之功。考厥实录，未详其致。精舍四周，雕镂石壁，作如来在昔修菩萨行诸因地事，证圣果之祯祥，入寂灭之灵应，巨细无遗，备尽镌镂。伽蓝门外南北左右各有一象，闻之土俗曰：此象时大声吼，地为之震动。」今阿旃陀石窟16号窟门前尚有一对石象，即玄奘所记之象。

德干高原有的是坚硬的玄武岩，被瓦格拉河 (Waghora river) 河水切割的河湾山崖，山势呈半圆形，正是建造石窟的绝佳地点。因此这里的石窟都是以挖凿辟洞的方式来完成，而不是运用营造构筑起来的。阿旃陀石窟共有29座洞窟，25座佛殿，4座僧房。石窟依其功能，分为刻有佛塔和其它雕刻供信众礼拜的「支提窟」，以及供僧众修行居住的「毗诃罗窟」，僧房里面简单陈设了石床、石枕，后来为了方便，在窟后中间也雕刻石像或彩绘壁画，成为综合式的石窟建筑。

阿旃陀石窟从相当于阿育王时代开始，以当时无佛像的小乘思想为主流，所呈现无雕刻作品的石窟，一直延续到大乘佛教收编了外道众多神祇的时代，让大大小小的佛像、菩萨、神祇等，历经约千年共筑完成了阿羌塔佛窟群。对于大小乘佛教转变的过程，阿羌塔佛窟群确实地将之纪录下来，如今能作为考据佛教历史兴衰的地位，阿羌塔佛窟群正充满着令人珍惜的疼爱。

阿羌塔佛窟群是从石山内部一气呵成雕凿而成，大都深具佛教内涵，主要是佛的本生故事、牧童放羊、六牙象故事等，由其清静庄严的写实手法，达到另一种艺术境界。可是也有一些轻率、呆板的壁画与雕饰。有些西方人认为宗教基本上应该弃绝俗世感官享乐的一面，所以对于此地运用如此艳丽的意象，来装饰神圣殿堂，疑惑不解并颇有微辞。

○爱罗拉（Ellora）石窟群

爱罗拉石窟群距离奥兰加巴城约二十八公里处，与阿旃陀石窟群相距仅一百多公里，共有三十四窟岩洞庙宇，全部是玄武岩材质所凿刻出来的。有人以「在坚硬的石山，雕凿出一座座里外皆美的殿堂」赞叹之。爱罗拉石窟群是结合了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的混合信仰，所以结构十分类似，尽管外观颇为一致，但窟内却是各有春秋，并诚实记载了佛教、耆那教和印度教的兴衰，这就是爱罗拉石窟群的最大特色。爱罗拉石窟群是于西元七至八世纪之间，属晚期才建造的石窟群，与阿旃陀佛窟群同样闻名于世，都是印度的国宝。这座石窟已于1983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

爱罗拉石窟群的菩萨像，除了有高髻和宝冠化佛外，与如来像并无多大差别，且无论显密大都是以现「在家相」的菩萨为主要信仰对象。爱罗拉石窟群分布在两公里长的路途中，前十二个石窟，已经有八世纪末的密教佛窟，也保存着当时佛教为了生存的必要，已融入了“印度教”的诸神信仰，佛像开始有多手多臂及忿怒像出现，并出现有曼荼罗的趋势。七到九世纪新崛起的印度教石窟是第十三到廿九窟。八至十世纪所建的耆那教石窟，规模较小，为较晚期的作品。

由于古印度各教从教义的分歧，一直到相互吸收，终于使各神都能分别示现在其他教，因此许多“印度教”的神祇被引入佛门，都以菩萨称之，最后使得信仰方式连自家人都分不清楚，也是造成佛教在印度被归并为“印度教”而消失的原因。

台湾南部佛×山某净土宗道场，在其极乐世界仿石窟的佛像展示洞里，贴了一张红纸，上写「密教兴，佛教亡」六个字。其实，佛教在印度消失原因，第一章里已谈到，佛教徒要检讨的地方很多，看完本书后一定更清楚，但千万不该愚蠢地只用那六字来推责。

○吐峪沟千佛洞

约开凿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吐峪沟千佛洞，位在鄯善县吐峪沟河河谷东西两岸的砂土岩壁上，是吐鲁番地区现存最古老的石窟。洞窟有礼拜堂、禅窟和僧房，其型制有中心柱窟、方形窟和纵卷顶窟。中心柱窟及纵卷顶窟大多呈长方形，分有前、后室，但因毁损严重，只见主室及后室。

于“小乘佛教”并未提及未来佛及过去七佛，凡出现有无数佛的“千佛洞”，可以想见是“大乘佛教”兴起以后的事。吐峪沟千佛洞有佛陀的本生故事，也有《观无量寿经》的经变图，虽然十六种观想的内容已残存剥落，但表示净土思想曾流行于吐鲁番一带。

有些菩萨戴着波斯「萨珊王朝」国王式的帽冠，帽两边的飘带较宽且直直垂下，与克孜尔、巴米杨及萨珊帽冠的飘带多弯曲飘扬或弯曲下垂不同，必因是早期的作品之故。石窟有犍陀罗、印度、汉式不同造型的佛像，可见这里是佛教艺术冲击兼融合的一个中心。

○克孜尔千佛洞

开凿于西元三世纪后叶的克孜尔（Kizil Grottoes）千佛洞，属于龟兹国的领土管辖，位于今新疆拜城县克孜尔镇东南约九公里的木扎尔特（提）河河谷的峭壁悬崖上，北靠明屋达格山，南面是荒凉的雀勒达格山，其间由于河谷水源丰富，故炎夏期依然花草茂密绿树青翠，风光幽静秀丽。克孜尔千佛洞的维吾尔语称为“克孜尔屋依”，意为「红色的千间屋」，可惜于十一世纪，因伊斯兰教进入新疆以后，便逐渐荒废。据《悟空入竺记》称安西（即库车）境内：「有耶婆瑟鸡山，此山有水，滴溜成音，每岁一时，采以为曲，故有耶婆瑟鸡寺（Yurpishka Vihara）。」在《宋高僧传》卷三也有类似记载。也是唐开元时有名的龟兹乐曲耶婆瑟鸡成曲的源由。

克孜尔千佛洞现有洞窟 236 个，现存壁画画面约一万平方公尺，其中最早的洞窟开凿于公元 4 世纪，最晚的建于公元 8 世纪。都是开凿在结构松散的砂石水积层的悬崖上，容易在风雨的侵蚀下崩塌，又经历一千多年来的地震影响，因此当初开凿的洞窟和窟前的设施有许多已完全毁损，甚至掩盖了底层的洞窟。龟兹地区的礼佛窟、讲经堂大都以中心柱窟式为主，窟室高大，窟门洞开，洞内平面为纵长方形，其前室则为方形，后部中央则凿出蘑菇状的佛塔，左右甬道天花亦是纵卷顶，但较主室要低，而存有仿波斯建筑的寺庙，其顶亦有圆形者。丝绸之路南道吐鲁番的房屋大多是拱形圆顶，可以免受炎夏天气，不管房屋、洞窟、庙宇、印度塔等建筑与犍陀罗发现的大体一致，但它们和北路的还愿佛塔是不一样的。

原先，克孜尔千佛洞是移植并模仿犍陀罗佛教艺术的代表，壁画中的神像拥有双翼，人物与画风都是罗马的风格。数百年后，唐太宗贞观年间，随着大唐帝国的统一和安西都护府的设立，汉人高僧又从中土将“大乘佛教”回传到西域，并且在原是信仰“小乘佛教”地区开窟建庙，把汉族风格的大型经变壁画绘制在西域的一些“千佛洞”中，如套式藻井顶的石窟建筑就是汉土的特色。晚期这种汉人捐资开凿兴建的汉风窟，与克孜尔千佛洞相邻，型制大致类同，就是库木土拉石窟（库木土拉维吾尔语意为“沙漠中的烽火台”）。

克孜尔千佛洞的佛殿附近，设有不少“僧房窟”，约占洞窟总数的四分之一，其形式多样，大多有门有窗，有炕有壁炉，大体上都宽敞舒适。一般由居室、甬道和小室组成。但因戒律规定僧房内不得画众生像，所以僧房内几乎没有壁画，若有也只是一些装饰性的线条而已。

克孜尔石窟壁画是在泥壁上直接作画，而不是画在涂白的泥壁上，千佛洞内的壁上所画的佛教画像有：本生故事、因缘故事、佛传故事、经变图画、动物造像等等，线条流畅，层次清楚，富有立体感。同时也发现到印度教史诗《罗摩衍那》〈助弥侯〉的本生壁画，显示印度教曾渗入佛教体系中来。还有众多伎乐飞天与龟兹舞蹈少女的美妙体态，轻盈优雅。其利用的西域画像的技法有「屈铁盘丝」、「曹衣出水」、「凹凸晕染」三种，并有菱形格构图的壁画创造，用铁线勾勒和晕染色彩的手法，每个菱形中以最有代表的画面来反映

一个本生或因缘故事，大大提高了绘画的表现和艺术水准，都令人赞赏不已。

除了佛画以外，洞窟还有大量的畜牧、狩猎、农耕、乘骑、手工、建筑的写照，显示的是以龟兹原有的艺术文化为主，再融合了希腊、伊朗、印度、汉地的艺术，创造出一种特有的艺术，这是古西域唯一所见的特色。

○伯孜克里克石窟

伯孜克里克石窟位在吐鲁番东北约 50 公里处，南距高昌故城有十公里，是俗称「红山」的火焰山峡谷木头沟中，也就是《西游记》所描述的火焰山。在银山之东的伯孜克里克石窟（Bezeklik cave），唐代名为“宁戎窟”，最晚开凿的时期迟至西元十三世纪。伯孜克里克之维吾尔语意为“美丽的有装饰之所”，壁画遗存总面积 1,200 多平方公尺。壁画以线描为主，色调以红为主，配以浅红、蓝、绿、黄、黑等色，画面艳丽热烈，其宝相庄严、朵云相间、图案美观。

伯孜克里克石窟最早的洞窟，约为高昌曲文氏王朝时期所建，历经唐西州时期、高昌回鹘时期、辽、元，直到十三世纪，一直是吐鲁番的佛教圣地。十四世纪末，伊斯兰教进入吐鲁番地区，由于宗教的冲突，石窟遭到严重的破坏。原有洞窟八十三个，现今上有五十七个。窟中绘画不但继承了早期传统的佛传，内容有本生因缘、初转法轮、降魔、焚棺等故事。也在各窟绘制千佛及以立像为中心的供养像，有回纥、蒙古及西域的供养人之画像，并有古代回纥文、汉文、波罗米文(Brahmi)、西夏文等题记、经文，为现今研究新疆地区各民族文化的学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伯孜克里克石窟的型制比较复杂，主要的构筑一是在断崖立面上开凿石窟，在窟前接砌土坯前室；一是在与断崖相接的台面上用土坯砌建成窟。两者均为银山以西各石窟所未见。

石窟平面大致为长方形和方形两种，以长方形的居多。北区以中心柱窟为主，中区和南区则为长方窟和方形窟。有的窟室中设有耳室及佛坛，窟顶主要为纵卷顶，亦有穹窿顶和套头顶。主室前凿有前室，有的数窟共用一前室，成为一组洞窟。窟内原配有塑像和壁画，但至今仅遗留少部分壁画。

○敦煌莫高窟

敦煌石窟（Dunhuang caves）是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万佛峡）的总称。莫高窟是中国四大石窟群之一，位在甘肃敦煌东南的鸣沙山东面的崖壁上，此座被称为“东方的佛罗伦斯”、“世界画廊”和“人类文化珍藏”的石窟，是举世闻名的佛教艺术宝库、综合博物馆。这座世界级文化遗产于公元 2004 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世界遗产名录」证书。保存有从五胡十六国至元代九百多年间不断开凿的佛教石窟。位于峭壁上的石窟上下排列着三层，大小不一，窟数极多，有形容说：「毗节（比栉）相连，累若蜂巢，宏伟无比。」莫高窟石窟是中国三大古石窟群之一。

莫高窟所在是一片砾石岩层，质地十分松软，并不适合雕成石像，于是形成建筑、彩塑、壁画三者合一的艺术建构。这种特殊彩塑又可分为影塑、高浮雕、圆雕三种。在北魏、西魏、北周三个时代是莫高窟彩塑艺术的发展期。

北魏的 277 号窟以塑造弥勒像最为典型，其半裸的身躯，着绿色透体的长裙，衣纹为贴泥条式，身体装饰长长的璎珞，造型朴拙、色彩淳厚，表情庄敬恬淡，带有中亚、天竺及波斯风格。

西魏的塑像，人物眉目开朗，菩萨或上身半裸，或褒衣博带，戴大冠着高履。人物已显现出南朝士大夫的“秀骨清像”，脸瘦颈细，穿交领襦衣，胸前束带作小结，外罩对襟式袈裟。

北周的彩塑开始出现具有道家意味的浮雕，人物造型则是融合西域的丰圆脸形与中原的秀骨清像，产生“面短而艳”的另一种风格。有所谓“秀骨清像，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之感。

唐朝的彩绘、雕塑都是莫高窟艺术的顶峰，人物曲眉秀眼，肤色晶莹光泽，其丰美、富丽、华贵、浓艳，显见当时文明富裕。唐以后则逐渐走下坡，而进入衰退期；宋代的塑像就有臃肿、笨拙、呆滞的感觉，已毫无生气。西夏曾加入莫高窟的雕绘，但呈现出苦涩、冷清的气息，显然与建国的苦难有关；元代因为密教的流行，所以出现藏密的佛像人物，长眉大眼，身姿婀娜，但又对比强烈。

据莫高窟所保存的文献，于武则天圣历元年（公元 698 年）刻记的〈李克让修莫高窟佛龕碑〉碑文记说自前秦建元二年（西元 366 年）开始，「有戒行清虚之沙门乐僔，尝杖锡林野，行至此山，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岩，造有一窟。」次有法良禅师，于其侧更即营建。从此开始开凿饮誉现今世界的莫高窟，应是敦煌石窟营建之首。

而 2004 年有大陆气象研究学者赖比星研究后指出，所谓的「金光」光象，其实是某些地区的特殊气候、地理环境条件下所形成的大气光象。莫高窟、峨眉山、五台山、黄山、庐山等地出现的「宝光」，就是光的衍射——反射成像原理，常因观者自己的身影投射到宝光中，就会现出佛影，反误以为是「佛祖显灵」，再加上半影或虚影的错位放大，相互重叠及遮掩作用，便觉得有无数个佛体在光象中跃动。这些情况千百年来必然有很多人碰见，而在科学知识贫乏的古代，无法明白这些现象，从此促成了信众们的热诚，因此付出无数的心血来贡献、开凿石窟。

直至十四世纪，莫高窟经过一千多年间不停的凿窟，至今共有 1680 公尺的石窟群，保存有 735 个洞窟。其中南区的 492 个洞窟是作为礼佛活动的场所，拥有彩塑佛菩萨等身像 2000 多尊，壁画 45000 多平方公尺，檐木构造窟 5 座；北区的 243 个洞窟是供僧侣修行、居住、瘞埋的场所，洞内有修行和生活的设施，但只少数有彩塑和壁画。

在莫高窟你会发现各朝代整修的痕迹，或许你脚踩着隋砖，眼看唐塑的佛头，背景是宋代的壁画衬托着，佛身却又是北朝的服饰，充满了时空交错的历史混合。可是如此「一代不如一代」的修补，洞窟越修越小，古老的塑像顶着清代的脑袋，让人有着一一种说不出的沉痛。

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 1900 年），在莫高窟发现了封闭达九百年之久的藏经洞，洞内藏有四至十一世纪的古代文献、纸画、绢画、刺绣等珍贵文物四万多件。其中以汉文、藏文、龟兹文、突厥文等语文抄写，内容包括了佛教经典、诗词曲赋、医药，甚至还有寺院的信札、契约。

有学者认为西元 1227 年，成吉思汗征服中亚，蒙军回军西灭西夏，位于甘宁边陲的黑水城，早已将文物封藏在塔基下。直到西元 1909 年才被俄罗斯探险队挖掘发现。所以猜测敦煌石窟藏经洞封洞的原因由来，与为了避免元军攻打而毁坏文物有关。

千佛洞的主持道士王圆篆发现以后，并不知道这批古物的重要性，而轻易地让外国人以利诱盗劫，致使这些石窟遗书流散世界各地，或被一些地方官僚收藏。自英籍匈牙利人（另一说是德人，带着来东方寻根的念头）斯坦因、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大肆搜括之后，又有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及俄人鄂登堡再次搜括殆尽。

而迟来的美国人华尔纳干脆利用化学药剂剥离壁画，成功带回两次，最后被当地民众发现，群起抵制才罢手回国。但是清政府对于此文物被劫的事件却不在乎，直到学者一再呼吁，才下令将残卷运至北京。由于搬运时的随便，加上沿途贪官污吏的窃夺，抵北京时只剩八千多卷残卷，目前保存在北京图书馆。

榆林窟又名“万佛峡”，与莫高窟并称为姊妹窟，位于安西县城南 56 公里处的榆林河峡谷而得名，开凿于北魏（西元 386-534 年），至元清年代，一千多年间不断增修，现存有四十一窟，壁画面积 5,650 平方公尺，雕塑 272 身。西夏民族曾占领河西近二百年，也在此窟留下“水月观音”、“文殊普贤度”等精美的作品。

○小结

西域的佛教好像一夕之间就被“伊斯兰教”（Islam，即国人通称的“回教”，意为信服真主阿拉的宗教，目前全世界约有五分之一人口信仰）所取代，而销声匿迹，如今空留下一些被破坏的遗迹。虽然有学者认为“西域佛教”被“伊斯兰教”所取代，也花上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往往是政治力量的干预，也造成佛教信仰的没落，以及佛寺建筑的无常。

这就是没有将正确的佛法深植人心，都只是强调积功德、求来世福报的结果。造成西域的佛教很快地被强悍的“伊斯兰教”所取代，其原因如此切确，大师们能不慎吗？

附录 印度历史年表:

- ☆史前印度 (B. C. 2500 年以前)
- ☆印度河流域文明时期 (约 B. C. 2400-B. C. 1700 年)
- ☆吠陀时期
 - 梨俱吠陀时期 (约 B. C. 1500-B. C. 1000 年)
 - 后期吠陀时期 (约 B. C. 1000-B. C. 600 年)
- ☆摩揭陀帝国
 - 哈尔扬卡王朝 (约 B. C. 545 年-)
 - 难陀王朝 (约 B. C. 364-约 B. C. 324 年)
 - 孔雀王朝 (约 B. C. 324-约 B. C. 187 年)
 - 巽伽王朝 (约 B. C. 187-约 B. C. 75 年)
 - 甘华王朝 (约 B. C. 75-约 B. C. 30 年)
- ☆外国入侵时期
- ☆笈多帝国 (约 A. C. 320-约 A. C. 550 年)
- ☆普什亚布蒂王朝 (约 A. C. 400-约 A. C. 647 年)
- ☆拉杰普特诸王朝时期 (A. C. 七世纪-A. C. 十二世纪)
- ☆德里苏丹
 - 奴隶王朝 (A. C. 1206-A. C. 1290 年)
 - 哈勒吉王朝 (A. C. 1290-A. C. 1321 年)
 - 图格卢克王朝 (A. C. 1320-A. C. 1414 年)
 - 萨伊德王朝 (A. C. 1414-A. C. 1451 年)
 - 洛迪王朝 (A. C. 1451-A. C. 1526 年)
- ☆莫卧儿王朝 (A. C. 1526-A. C. 1857 年)
- ☆英国殖民时代 (A. C. 1757-A. C. 1947 年)
- ☆印度自治领 (A. C. 1947-A. C. 1950 年)
- ☆印度共和国开始 (A. C. 1950 年-)